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半年刊)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Bi-annual)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Administe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主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

Directed b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承办: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Edited at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出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顾问 (按姓氏音序)

Consultants (in alphabetical order)

陈章太

Chen Zhangtai

刘润清

Liu Runqing

孙宏开

Sun Hongkai

主编: 戴曼纯

Editor-in-chief: *Dai Manchun*

编辑: 张天伟 李艳红

Editors: *Zhang Tianwei, Li Yanhong*

编审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

Editorial Board (in alphabetical order)

主任

Chairs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Li Yum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Wen Qiuf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委员

Members

蔡永良 上海海事大学

Cai Yongliang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戴桂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

Dai Guij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

Dai Qingxi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傅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

Fu 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郭龙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Guo Longsheng (MOE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韩宝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

Han Baoche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侯敏 中国传媒大学

Hou M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黄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Huang X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贾文键 北京外国语大学

Jia Wenj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u Dingf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苏金智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Su Jinzhi (MOE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Wang Kef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张治国 上海海事大学

Zhang Zhiguo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周庆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Zhou Qings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电话: (010) 88818236

本刊地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邮箱: yzcgghy@126.com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编辑部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第1卷 第1期 (2014年6月)

目 录

创刊词	戴曼纯	
领导和专家寄语	陈章太 刘润清 张浩明 周庆生	
特稿		
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	李宇明	1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	戴曼纯	5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学习感言.....	郭龙生	16
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中四个术语的辨析.....	张治国	24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法国多语制政策的战略意义与意识形态冲突.....	李清清	31
民族认同视角下的塔吉克斯坦俄语地位变迁.....	杨 波	43
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语言传播新政策.....	马继红	51
书刊评介		
语言管理: 语言规划的新走向——《语言管理》评介.....	王 辉	60
《少数民族语言与多语教育——连结本土与世界的桥梁》评介.....	李 丹	65
英文摘要.....		72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稿约.....		74
格式体例.....		75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语言政策沙龙”征稿启事.....		79
《语料库语言学》稿约.....		80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介绍.....		81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Volume 1, Number 1 (June 2014)

Table of Contents

Articles

Diglossia, bilingualism and their policies.....	Li Yuming	1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Dai Manchun	5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ies abroad	Guo Longsheng	16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our LPLP terms: Domestic and foreign perspectives	Zhang Zhiguo	24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ideological paradox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of France	Li Qingqing	31
The change of Russian language's status in Tajikistan: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Yang Bo	43
New policy for Russian language diffus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a Jihong	51

Book Reviews

A review of <i>Language Management</i>	Wang Hui	60
A review of <i>Minority Languages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Bridg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i>	Li Dan	65

创刊词

戴曼纯

在国际学术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早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备受学界关注。专门刊发此类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期刊有《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语言社会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当代语言规划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欧洲语言政策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等，其他刊物如《双语研究期刊》(*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语言、身份及教育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社会语言学季刊》(*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社会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ety*)、《多语言》(*Multilingua*)、《对外英语教学季刊》(*TESOL Quarterly*) 等也刊发相关论文。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尤其是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Palgrave, Springer, CUP,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outledge, John Benjamins 等出版社推出不少系列著作，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数十年中，我国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在国家语委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取得了丰硕成果，汉语规范化、普通话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建设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和谐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些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关注的范围涵盖国内外语言政策及规划问题，研究的问题不仅涉及语言地位、语言本体，还包括语言政治、语言生态、国家语言能力等重大问题，有的研究还上升至语言战略和国家安全高度。

学界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关注度从中国知网数据可见一斑。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章名包含“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的文献，我们发现2000年至2013年国内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幅惊人。2000年题目含“语言政策”的文章为4篇，含“语言规划”的文章为3篇，2013年分别达到45篇和38篇。以“语言政策”为关键词搜索文献，也增幅甚大，由2000年的14篇上升至2013年的122篇。以“语言规划”为关键词搜索也发现近似的增幅，2000年为11篇，2013年达到84篇。此外，还有大量没有注明这些关键词的文章。很显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已然发展为一门愈受关注的学科。

为了推动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学校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杂志。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是国内第一种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名称命名的专业刊物，目前常设栏目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包括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规划研究、语言生活、语言理论、书刊评介等。我们的宗旨是：为国内从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从事微观社会语言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把杂志办成了解国内外语言政策及规划、社会语言生活及其变化的窗口。

我们真诚欢迎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吝赐稿，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

领导和专家寄语

语言是人类重要交际工具，是文化信息载体，是社会资源财富；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变为麻烦和问题。它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社会进退、事业成败，乃至个人荣辱，因此，需要制订、实施科学、严谨、实效、可行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以引导、促进语言及语言生活沿着自身演变规律，丰富、规范、健康、和谐地发展，在国家、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依据当今中国国情、语情和社会情况，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研究、制订、实施中，必须充分体现“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国家语言政策基本精神，继续保持主体性与多样性紧密结合，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各民族语言文字并存分用，各自发挥其作用的国家语言生活主要特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创办，适逢其时，正合各方面需要，对促进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制定与实施，推动语言规划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相信一定会得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同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办出特色，显示水平，在实现中国梦当中，发出正能量！恭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创刊！

陈章太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会长)

2014年5月14日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将服务于国家、促进外语学科发展视为重要使命。中心近年来将语言政策确立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利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优势，凝聚了优秀的科研团队，设立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二级博士点，培养该领域的高级研究人才。多年来，中心承担有关语言政策及规划科研课题10余项，中心专职研究员向教育部等部门提交多项咨询报告和专家建议，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意见。2014年是我中心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方向值得纪念的一年。在学校及外研社的支持下，中心创办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杂志正式出版，为该领域的学者增加了一处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

预祝此刊硕果累累，前途辉煌！

刘润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2014年6月3日

欣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创办《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杂志，特此祝贺！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语言文字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等的关联更加密切，已经成为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要素。当前，社会语言生活日益复杂，语言观念日趋多元，语言应用中的价值冲突逐渐增多，妥善开展语言规划，科学制定语言政策更为迫切。作为语言文字事业的基础依托学科，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应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是一门跨领域的新学科，需要不断地自我建构、自我完善。但我相信，面对着当今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富矿，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一定大有可为，一定大有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创办，得风气之先，为相关学者搭建了交流平台，无论对于学科的建设还是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都将会大有裨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

希望《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有灵气、扬锐气、接地气，在传播新知、引领方向、培养队伍、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祝愿本刊稳健发展，硕果累累。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2014年6月3日

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命名的正式期刊，终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问世了，这在中国可算是第一家吧。谨向该刊创办者表示由衷感谢和崇高敬意！

贵刊的创办是该学科发展及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相关教学科研人员及语文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从此以后，业内就有了一个展示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新园地和新平台了。这必将推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向着更成熟更繁荣更稳健的方向迈进。

作为语言政策规划园地中的一颗新苗，人们对它的期许，难免会更多更重更大，希望该刊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关注理论，聚焦实践；有名家大腕引领，又有新人新秀跟进；既有学术影响力，又具学术权威性。我们深知，万事说着容易，做到极难。衷心期望这棵新苗，能在广大业内人士的关注呵护和支持下，茁壮成长，长盛不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

2014年5月30日

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

北京语言大学 李宇明

语言规划是为语言生活服务的。语言规划该如何制定，语言规划制定得合适与否，要看它是否切合语言生活的实际，是否能够引导语言生活健康发展。因此，要科学制定语言规划，必须了解语言生活，了解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语言生活既是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语言治理的对象和基本依据。

1. 双言双语生活

中国当下的语言生活虽有某些不和谐现象，但总体上还是健康且充满活力的，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由单言单语生活正快速向双言双语生活发展。

1.1 双言生活

“言”是指一种语言的不同使用变体，普通话、方言、甚至文言都是当今汉语的使用变体。双言生活也包括多言生活，是指在语言生活中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变体的情况。双言生活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语言生活。

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以普通话为主，但是方言也在特定场合、特别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在全国的“两会”上，有用方言讨论国是者；一些高级公务员，有用方言行使理政职责者；国家级的广播电视，也常能听闻方言之音者。省域层面的语言生活，基本上是普通话和方言“双言兼用”；书面语以普通话为主，口语中方言与普通话平分秋色。县域层面的语言生活可能是以方言为主，但普通话使用的场合越来越多，能说能听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普通话的作用越来越大。

从社会领域来看，广播电视领域以普通话为主，但也存在一些方言台、方言频道和方言节目；方言在广播电视中的应用，南方多于北方，地方多于中央，不上星节目多于上星节目。教育领域以普通话作为基本的教学媒介语，但也有教师用方言讲课；方言的使用非师范类学校多于师范类学校，理工科教师多于文科教师，老年教师多于青年教师，高学段多于低学段；此外，方言知识或是方言课，也纳入一些学校的课程。大众服务领域也是双言并用，对大众服务较多使用普通话；企业内部的工作语言，方言占有一定的使用比例。

双言生活古已有之，方言邻接处、移民都市里，古来都是双言兼用。但那时

* 此文是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写的序言。文中的一些内容，曾经以《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人》为题在“2014年中青年语言学沙龙”报告过。该沙龙已经持续多年，这次活动在2014年1月18日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商务印书馆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沙龙主题为“双言双语与当下中国”。近闻《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创刊，谨奉此文，以表祝贺！

的双言生活是“自然双言生活”，其特点是双言生活自然形成，双言中共同语的作用不突出，分布范围较小。而今的双言生活是“理性双言生活”，是通过语言统一的社会语言规划形成的，是通过学校教育形成的，普通话在双言中占主导地位，双言生活遍及全国。

1.2 双语生活

“语”指不同的语言。“双语”包括“多语”，双语生活包括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和汉语方言、民族语和民族语、母语和外语等多种类型。我国双语生活也是自古有之，当今的大概情况是：民族地区双语生活逐渐成为主流。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双语使用上有些差异，有的地区、有的民族以母语为主，有的可能较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就全国范围来看，双语生活还只是出现在部分领域和部分场合。在国家重要的政治生活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语言，是会议工作语言。地名标牌、公共指示等城市指示系统，基本采用了双语或多语。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网页多数都有双语，起码会有一个英文网页。在国际事务方面，双语居多。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基本上都采用双语。高等教育领域也有对双语课程的提倡。在通信、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也较多采用双语。甚至在个人生活里也有双语应用，比如名片的正面印中文，背面多数印英文。

总体来说，双语生活在我国还是地区性的和领域性的，没有达到双言生活那样的普及程度，从发展趋势来看也不可能达到普及程度。

2. 多元文化生活

双言双语生活是多元文化生活在语言领域的表现。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处在多元文化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许多民族都有历史文化和方言文化，比如汉文化就有东西南北的差异，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古今方域的文化交汇在一起，绽开一朵朵文化奇葩。外国文化不断引入中国，比如古代的印度文化，现代的欧美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外文化交合在一起，形成文化的百花苑。特别是欧美文化、日韩文化的影响，使中国由传统的多元文化社会发展到现代多元文化社会。

多元文化生活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是他们把不同的文化汇集在一起，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把不同的文化汇集起来，纵使是单言单语人，也能够了解和享用多元文化。传统的中国早就多元文化并存，但是儒家文化占据着统领地位，在文化接触中常常同化其他文化，而且由于社会发展节奏缓慢，文化之间接触的频度、力度相对较小，一般人常常感受不到异文化的影响。而今不然，交通、通信和网络的快速发展，不同文化的

交流速度加快，交流范围加宽。现代通信、传媒和网络，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小夸张说法变成了鲜活的生活现实。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口大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前所未有，流动人口不断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西部到东部。放眼世界，中国这种人口流动其实只是世界人口流动的一个缩影，全世界人口也在快速流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小国家到大国家，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人口流动在世界各地都像是“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套娃，里面有一个相似的套娃，再打开一个套娃，里面还有一个相似的套娃。大幅度、高频率的人口流动，带动着文化的流动，给流动者和流动地带来不同文化的体验，多元文化生活逐渐成为生活的常态。

纵向文化传承和横向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两个方向，也是文化扩展的两种方式。过去，文化以纵向传承为主，而今横向传播成为重要甚或是主要方式。横向传播的力度加大，使得文化代沟越来越深，形成代沟的时间急剧缩短，过去几代人才能形成文化代沟，而今一代人、甚至是20年、10年就能形成一条代沟。祖、父、孙三代同堂，60后、70后、80后、90后同戴一片天，但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生活嗜好，却可能大有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与之相关，纵向文化的传承明显受到阻减，故而常常引发社会的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促使社会采取各种“文化保护”措施：第一，努力宣扬、弘扬传统文化，努力防范外来文化的“渗透”，试图让本我文化在后代中顺利传承；第二，利用横向文化传播的机理与机会，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更多地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强盛；第二，让社会能够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生活。当然，这种文化焦虑有时也可能助长“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情绪，助长“语言纯洁观”的流行，外来词、外语学习常常成为社会批评和改革的对象。

不管人们怎样思考与行动，多元文化生活是不能回避、不可改变的现实。多元文化生活要求人们具有跨文化生活的能力。跨文化生活能力应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应当成为双言人和双语人，具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第二，建构多元文化的知识框架，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第三，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既能了解和守望本我文化，又要学会对异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3. 双言双语政策

双言双语生活，既是多元文化生活的表现，也是多元文化生活的促进因素。大量研究表明，双言双语对个人的发展具有诸多优越性，比如：可以有更宽阔的文化胸襟，更易客观看待不同文化和亚文化；可以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扩大活动半径和生活半径，易于找到较为合适的工作，双语人的就业机会明显多于单语人；有利于开发不同脑区，丰富大脑的智慧等。双言双语人有利于国家进步，能够引进异文化而增加本我文化的发展活力，能够向外传播文化而增加本我文化

的影响力，能够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以帮助完成国家使命，能够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乃至与军事、经济等相关的硬实力。

造就双言双语人，营造双言双语生活，需要政策支撑。我国的教育正在批量培养双言双语人：推广普通话造就了大量的双言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外语教育等，造就了大量的双语人或三语人。但是，国家对公民的语种能力还没有出台相应的要求，对双言双语现象还缺少政策视域的研究和政策层面的自觉。在大量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为满足多元文化生活的需要，应制定合适的双言双语政策，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合适的双言双语政策，首先能够指导双言双语生活，规范某些层面、某些领域的双言双语生活，减少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中国语言与外语的矛盾冲突，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其次，有利于培养优势双言双语人。优势双言人，其掌握的双言中包含国家通用语言；优势双语人，其掌握的双语中，包含地区或世界较为通用的语言。优势双言双语人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第三，能够保证国家特需的双言双语人的培养。国家特需语言，是指国家在外事交往、国家安全、国际维和、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特殊需要的语言或方言。培养国家特需的语言人才，是国家能够拥有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语言能力的保证。

当前的语言规划表现出较浓的“单言单语”意识。在多元文化和双言双语生活的现实中，应当确立“双言双语意识”，认识到双言双语是先进的语言生活，是未来公民的素质，是强国智民的必由之道。在这种语言意识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双言双语生活，研究双言双语人，语言规划及相关政策都能有利于双言双语人的培养和发展，有利于营造双言双语生活，从而使国家和公民都能够适应已经成为常态的多元文化时代。

作者简介：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戴曼纯

提 要：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作为社会大规划的一部分，具有跨学科性质。由于研究视角众多，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根据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和论述探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界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效、理性选择模式及其他主要研究问题，以期展示学科的基本内涵。以往的研究和实践表明，语言政策及规划具有区域、时代、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局限性，任何语言政策制定和规划都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多样性

1. 引言

我国近几十年来在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汉语言文字标准化、推广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建设、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外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民族和谐、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范畴，是关注社会的社会语言学，不同于微观社会语言学是关注语言的社会语言学（Nevalainen & Raumolin-Brunberg 2012）。作为当代社会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语言规划具有跨学科性质，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Jernudd & Nekvapil 2012）。语言政策及规划作为一个学科源于西方学界，其主要思想和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主要讨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界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效、理性选择模式及主要研究问题，以期展示学科的基本内涵。

2. 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界定和本质

语言政策及规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小到词语发音和使用，大到语言选择和学习，都属语言政策及规划范畴。语言是构建群体的关键要素之一，所有儿童都被各自的语言群体社会化，成人则努力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交际能力，教会儿童掌握群体使用的词汇和语言结构，并适时纠正。因此，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管理、保护、推广语言，各种形式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不同社会应运而生（Wright 2007: 164），个人、家庭、公司、组织和政府都可能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主体。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犹如一对连体孪生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各自不同。学者们在各自的论述中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做出了不同界定，背景各异，用意不同。美国学者Einar Haugen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的语言规划概念，指的是一切旨在改变言语社团语言行为的所作所为。语言政策有时被用作语

言规划的同义词，但准确地讲，语言政策是具体语言规划过程背后更宽泛的语言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Deumert 2009: 371）。也有学者（Skutnabb-Kangas & McCarty 2008）认为，语言政策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包含官方颁布的法案和文件，以及关于语言形式和运用是否合法的日常语言规范；语言政策影响某一政体内语言或其变体的地位、权利、作用、功能和使用，以及社会组织和制度。语言规划也是社会文化过程，往往通过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促使人们改变语言的使用。语言规划可能受以下一种或数种导向的影响，（1）语言被视作问题（因而必须消除语言多样性），（2）语言作为权利（在语言竞争环境中解决语言权问题），（3）语言是资源（促进语言民主和多元化）。总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均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二者密不可分。

我们再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另一种界定。Fishman（1974）把语言规划界定为刻意改变语言地位、结构和习得所做的努力。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大范畴（包括住房、就业、迁徙、税收政策在内的广大公共政策领域）的组成部分，有明确的目标和实施方案。语言政策指官方机构和部门（如教育部、校方、单位领导层）实施的隐性或显性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可以是国家或机构针对语言结构、使用和习得制定实施的指导方针和规定，既可能是明文规定（如语言政策入宪）也可能隐而不言。虽然语言政策由政府机构制定和推行有其优势，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政策既可由公共机构（如政府机关、学校、法院）负责，也可由私人机构（如公司、企业、非政府组织）自行制定（Tollefson 2011: 357）。上至政府机构下至黎民百姓制定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均会对社会结构和发展、人们的生活等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教育。仅有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而无习得规划便无法达到目标。习得规划负责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实施。一旦政策制定者确定某一语言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作用及具体语言形式，语言习得就由教育工作者负责组织实施（Cooper 1989: 1），即习得规划通过语言教育和规划来完成。而语言教育政策指正规教育中和语言习得有关的政策，一般包括各级政府的法规和文件，下属机构的常规工作等（De Korne 2010）。

早期的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相关且有三个关键的共同点：（1）乐观地认为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使少数民族语言群体受益；（2）政策及规划专家应当在制定、实施高效合理的计划和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3）学术研究及实践应当聚焦于民族国家。一般认为政府的教育机构在语言政策及规划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这一认识使早期研究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但是，早期的做法有几个不足：（1）忽视了社会政治体系的复杂性，政策与实施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极为复杂，社会群体往往有不明言的不同目标；（2）关注国家政策和规划，忽略语言教育对象的态度和语言习惯；（3）过于相信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整合小族语言群体的价值（Tollefson 2008: 4-5）。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是因为语言政策及规划

具有区域、时代、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局限性。政策及规划的指导思想在变化，彼时彼地可行有效的做法在此时此地已失去价值。

3. 学科发展脉络

一般认为，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进入社会语言学领域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学科发展与当时许多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面临国语选择和推广问题有关。语言选择、标准化及推广，国家团结与发展等问题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使学科朝着问题驱动型方向发展。但是，语言是否能为规划在学科发展初期备受质疑。当今学界认为语言可以被规划，但并不意味语言应当被规划（Deumert 2009: 371）。现代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早已摒弃规定语言学，语言学界执牛耳者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对语言规划持反对态度不仅因为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与规定主义截然不同，而且还因为语言规划超出了语言学范畴，是一门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的跨学科（Jernudd & Nekvapil 2012: 17）。来自非语言学领域的理论中（尤其是社会文化理论），有的带有整合社会的倾向，有的则推崇语言文化多样性。关于语言的不同认识论在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界表现出不同倾向：语言纯洁主义、描写主义、自由主义等。正因如此，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主流理论。

为了解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的本质内涵及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参考新近出版的《剑桥社会语言学手册》（2011）和《剑桥语言政策手册》（2012）。前者的作者之一Tollefson（2011: 357-376）对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的归纳整理，将学科的现代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经典及新经典时期、批判与幻灭阶段、学科复兴阶段。后者专辟一章（参见Jernudd & Nekvapil 2012: 16-36）简介语言政策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前现代、近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前现代阶段的典型代表是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及其推行的语言政策及规划，法兰西学院被视为欧洲许多类似机构的典范。19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运动以语言规划为手段，以满足语言和文化需求为由，将社会目标 and 政治目标合法化，并试图完成这些目标。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属于近现代类型，但是兼具前现代和现代阶段的部分特征。而捷克斯洛伐克同期由布拉格语言学派推行的语言规划带有明显的现代阶段特征，即重点关注微观层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社会问题，注重细节，不求大变。1918年从哈布斯堡帝国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族群较多，族际交流问题严重。布拉格学派致力于完善多数人使用的标准捷克语，其语言完善理论享誉世界，被后来的“经典语言规划”认可接纳。作为布拉格学派语言规划标志的基本概念（如语言规范、语言功能、语言雅化、语言培育等）对后来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我们主要根据Tollefson（2008, 2011）及Jernudd & Nekvapil（2012）的阐述，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简要介绍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的发展阶段。

3.1 (新) 经典阶段

近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大部分研究聚焦于设计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理论框架, 研究有限的实际问题, 例如新兴民族国家的本体规划。早期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 受现代化理论影响严重 (Tollefson 2008: 3-4)。学科发展初期一方面缺少理论, 另一方面关注的问题不够全面。因此, 不少学者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指导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 关注的问题由此拓宽, 涵盖语言本体和语言相关问题。

根据 Tollefson (2011) 的观点,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为学科发展经典时期 (包括后期的新经典阶段), 为语言政策及规划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学者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在大量案例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这样的观点: 语言是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初建国家面临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挑战中最核心的问题。例如, 后殖民国家的教学语言是否应当继续使用殖民者的语言? 地方及本土语言是否应当通过标准化最终在公共领域代替殖民语言? 多语国家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通用语? 各不同教育层次应当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案? 没有文字的语言或一语多文的语言是否应当设计新的书写系统? 此类问题, 不一而足。许多情况下, 这些问题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语言政策及规划在发展初期被认为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而实际上其价值远不止此, 语言政策及规划还可以用于解决和语言相关的问题 (如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政治架构)。初期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仅区分地位规划 (确立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 如教学语言、行政管理语言、司法语言) 和本体规划 (针对语言结构方面实施的规划, 包括标准化、词库建设、创制文字、纯洁化、国际化等), 后来才加上习得规划 (通过语言学习推广语言, 促进语言传播)。实际上, 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 本体规划往往是地位规划的手段或延伸。虽然语言政策及规划发展初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或操作模式, 但是对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量案例研究得出一条关于多语社会语言问题的重要结论: 多语社会最好是稳定的双言社会, 即两种相近的语言变体明确用于不同领域。双言概念的含义在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 涵盖范围更广, 即不同语言使用范围采用了两种 (甚至两种以上) 语言变体 (包括同属一门语言的方言、社会方言, 乃至不相关的语言)。双言的稳定性主要在于语言变体不是竞争关系, 而是各司其职的互补关系; 双言的功能划分是社会的自然选择。如果双言的使用范围出现交叉, 则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双言关系。对此, 语言政策及规划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多语社团的利益, 清晰划分不同语体的用途。(新) 经典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依然在影响当今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 没有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 语言政策及规划就无从谈起。

3.2 批判与幻灭阶段

新兴后殖民多语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规划成效令人失望。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新)经典语言政策及规划遭受批判。批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经典时期把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现代化和发展过于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将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例如将本土语言词汇系统现代化、制定教学方案向小族语言使用者快速传授主流社会语言。而事实上，经典时期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往往未能促进经济发展。第二，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对受国家政策和计划影响的社团关注不足，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部及其他国家机构自上而下的规划上，忽略了语言小族的政策偏好、学习通用语对社团的影响、身份认同、幸福感等问题。第三，政策推广忽视了普遍存在的强制性问题。其他批评包括：经典时期看重显性政策，忽略了隐性政策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过分关注机构（如学校）这一宏观层面，忽略了微观层面；没有注意不同语言变体的成本效益问题，比如为什么某些语言适合作为高阶语言、为什么低阶语言不可用于高阶场合等（Tollefson 2011）。

Jernudd & Nekvapil (2012) 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指出，许多学者不赞同经典语言规划隐含的理论基础，因为它破坏了语言规划的中立性。语言规划带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意图，旨在促进现代化，结果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

席卷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的各类批评最终导致新思路和新方法的诞生，由此出现新的核心问题，如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社会不公的关系、语言政策及规划的思想本质、语言小族的感受、政策及规划的民主模式等。很显然，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关注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3.3 学科复兴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受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尤其是批评理论）的影响，开始复兴。这一阶段的早期研究大多关注影响规划和政策的历史因素和社会结构力量，特别是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运用批评理论的历史结构观（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与（新）经典时期的认识有本质区别。例如，经典时期强调个人决策及政府部门的作用，历史结构观试图释放影响语言运用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不将个体语言决策视为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而是探索成本效益具体表现方式的潜在原因：为什么有的群体必须耗费成本去学习主流语言、为什么某群体的成本效益不同于其他群体、语言政策带来什么利益等。在历史结构观视野下，个体语言决策不能视为个人选择，而应视为复杂历史结构因素产生的结果。正是复杂的历史结构力量造就了社会系统，个人必须遵循社会系统行事。语言政策的历史结构观重视历史因素的作用，把历史关系视为根本关系，不做细致的历史分析就无法搞好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历史分析法重视结构因素（特别

是经济阶层因素)划分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历史结构观认为成功实施的语言规划通常服务于强势群体,因此单纯评估政策实施的成功程度意义不大,评价的重点在于语言政策及规划如何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影响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影响(Tollefson 2011)。Jernudd & Nekvapil (2012)所指的后现代语言规划类型反映的正是西方社会关于语言的新认识,重视语言权,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语言多元,承认并支持社会多样性,保护社会多元特点。

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转向关注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公正仅仅是该学科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的第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科出现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并且把其他领域的研究思路引入这一学科,例如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s)、语言生态观(ecology of language)、治理观(governmentality)等(Tollefson 2011)。

世界体系论区分中心和边缘,关注中心语言(如英语)对边缘世界精英的作用,许多边缘国家精英在中心国家或本地精英学校接受教育,教学语言采用中心语言;甚至有的边缘国家(如菲律宾),非精英阶级也被迫接受具有官方地位、用于教学的中心语言。运用世界体系论的代表性观点有Phillipson(1992/2012)的语言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一般指强大的外部群体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规范强加在他人头上,与欧洲的殖民扩张密切相关(Mühlhäusler 1996: 18),中心国家或社会通过剥削、非等价交换等手段统治边缘国家或社会。所谓语言主义,则是指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被赋予令人向往的特征属性,起着吸纳作用;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语言被赋予相反的特征属性,起着排斥作用。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是语言主义的一种。只要把英语推广政策置于帝国主义框架下进行考量,就会了解到强大的中心国家以牺牲边缘国家利益为代价,通过推广英语保障中心国家的利益。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合法化依靠两个手段推行教育语言规划:语言文化(盎格鲁中心观)和教学法(职业化)(Phillipson 1992/2012: 47)。因此,有人如此批评语言帝国主义,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在殖民过程中成为杀手语言(Mühlhäusler 1996: 20),导致大量本土语言消亡。

语言生态观将社会语言与生物多样性进行类比,其核心思想是尊重语言多样性,关注濒危语言、语言活力、语言维护和语言复兴,坚信社团语言对形成身份和归属感的价值,坚信异质和杂合是所有语言的根本特点,关注语言权利。例如Wright(2004)从语言生态角度论述南非语言政策时指出,英语在经济中的势力是促使南非语言生态朝双语互利形式(a form of diglossic mutualism)发展的主要动力,英语在全国范围内用于高层交际,而非洲语言起着重要的互补作用,南非语(或称南非荷兰语)正日渐获得语言交际的补充地位。南非语已发展为适用于高等教育的语言,但英语是广泛获得知识的工具及国际学术界发表成果的语言,南非语在许多学术领域还处于次要地位。使南非民众广泛接受语言生态多样性的

关键在于将重心从研发政策转向研究语言能力的培养，为南非语言的复兴提供保障。

语言政策及规划使用的治理概念源自 Foucault 的论述。Foucault 使用的治理有两重含义：一般指伴随国家利益出现的管理艺术，第二种含义更窄，指 18 世纪开明政府的出现 (Bröckling *et al.* 2011)。治理观体现行政、法律、财政、制度、专业部门、具体做法及手段等在内的所有规约个人及群体行为的力量。语言政策及规划 (尤其是这方面的话语)、教育及其他机构的做法均视为社会规约手段。按照语言治理框架研究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学者探索语言、文化及教育如何形成不同的制度，而制度对于管理而言至关重要。语言治理关注 (尤其是机构内部的) 日常话语，将语言政策表述为文化政策，视其为决定人们态度和行为的道德观及政治观。语言政策不是推广或限制某些语言，或仅仅为实现更大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而是从广阔的文化领域和历史领域进行考量。

从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几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学科内涵在不断扩大，从带有明确社会政治目标 (如实现一国、一民、一语三位一体的目标) 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逐渐演变为重视语言权、保护语言生态、消除社会不公、保护语言多样性等。关注点的重大转向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是不断考量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社会政治成效的结果。

4. 语言政策及规划的成效及理性选择模式

语言政策及规划实施的成功程度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相对成功，也有国家努力而效果不佳。当今欧洲不少国家的建立与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密切相关，例如法国的民族建设离不开法语相助。可以说，语言政策及规划曾对欧洲的民族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近现代早期欧洲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始于西欧本土语言的标准化及其传播。第一批摆脱封建主义的民族国家有法国、西班牙、英国、瑞典和荷兰。统治王朝战胜来自贵族的权力挑战，确立了稳固的疆界。随后出现的中央集权时期使首都和宫廷使用的方言获得比国内其他方言或语言更高的地位，成为行政部门通用的语言。例如，法国国王 1539 年颁布敕令，降低拉丁语在公文、合同和司法领域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国王使用的语言，不容有他。1536 年英国的《联合法案》规定，只有学会了英语的威尔士人才可以担任公职 (Wright 2007: 165)。欧洲国家的语言规划产生了明显的政治效果，即国内的语言愈趋统一，差异在缩小，而与邻国的语言差异则出现最大化。国界实际上也是语言边界。许多欧洲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原因离不开民族主义思想、忠于国家、积极科学的态度、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教育普及、工业化等。尤其是工业化吸引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前往城镇这样的语言大熔炉，人们不得不使用国语作为通用语。虽然欧洲大陆被语言分割成若干国家的过程从未彻底完成，但是教育部门和中央政府推行的显性语言政策和规划，以及作为其

他政策（比如大规模征兵）副产品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促进了国家内部团结，建立起了语言疆界。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洲语言政策及规划远比美国同期成功。美国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成立的政府没有几届像那些欧洲国家一样努力实现语言、民族和领土融合一致的民族主义理想。迄今为止，美国仍未制定并推行显性的国语政策，唯英语运动仅反映出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诉求。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属于积极推行语言政策及规划工作的国家，但是国语未能全民普及，尚未成为所有公共领域的交际媒介（Wright 2007: 166-167）。这些事实说明，语言政策及规划的推行效果受制于诸多因素。尽管欧洲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相对比较成功，但是很难真正做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三位一体的政治目标。在语言融合度不高的地区（例如前南斯拉夫），小族语言群体一直给国家带来政治困扰，甚至造成分裂。这就足以证明语言融合政策的优势和价值。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格局的变化，过去推行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必须重新评价并做出调整。欧洲过去以语言规划为手段促进民族建设，对当前的欧洲一体化带来不少障碍。例如，欧洲国家把语言政策和教育置于主权之中，各自为政。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和拥有47个成员国的欧委会（包含所有欧盟成员国）在教育事务和语言事务方面权力有限。他们的主要作用只是推行一体化、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自欧盟将2001年定为欧洲语言年以来，语言政策研究出现新的势头，2007年设立多语专员职位，负责语言政策，但是随着2010年新的欧盟委员会入职，多语领域的工作并入欧盟教育、文化、多语及青年专员的工作。欧盟委员会的多语政策有三项基本目标：所有公民可以用自己的母语阅读欧盟文件，促进多语经济，鼓励语言学习、提倡社会语言多样性。语言政策远期目标是，每一位欧洲公民除母语之外从小至少学习并掌握两门语言的基本技能，即所谓M+2方案（Cenoz & Gorter 2012: 307）。很显然，推崇语言文化多样性使欧洲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语种（如英语、法语、德语等）之间、大语种与小语种之间的角力场。最后的胜负遥未可知。语言帝国主义在此似乎难有市场，语言生态观和语言资源论也许能有一席之地。

根据Deumert（2009: 380）论述的语言规划理论，语言是一种社会资源。语言就像黄金、煤炭和水一样的自然资源，社会上的语言使用可以合理系统地进行规划。语言规划的特点是在不同解决方案中作出合理的选择。决策过程分五大步骤：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提出解决方案、分析成本效益（cost-benefit）并合理选择方案，实施解决方案，通过比较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进行评估。

所谓语言规划问题，一般指创制文字、编典及现代化。但欧洲当前的语言规划不存在这些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语言选择和组合。理想的语言规划应当建立在深入了解社会语言状况的基础之上。实况调查是理性决策的先决条件，包括全国性普查和大型社会语言学调查，以便确定母语使用人数、二语使用人数、双语使

用程度、语言选择与维护方式、语言态度等。成本效益分析在语言规划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有别于经济学家广为采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效益分析，因为语言规划的成本效益分析需要考虑非物质因素。规划者必须明确目标、问题及结果，掌握决策过程所需要的信息。成本效益分析在语言规划中的应用有两个难点，一是语言规划耗时长（有的长达几十年），难以准确计算出成本和效益；二是语言规划的效益很难用金钱衡量。

以比利时为例。虽然比利时推行法语和荷兰语（佛兰芒语）双语制耗费很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只选择法语或者荷兰语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因为语言身份与文化身份之间的联系在比利时尤为密切。我们再以波兰为例。像许多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选择俄语还是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问题。按照成本效益分析，波兰有两种选择：继续将俄语作为第一外语，原有课程设置不作变动；或者用英语代替一直作为第一外语的俄语。如果引进英语作为第一外语，需要消耗的成本包括培养英语教师、支付英语教师工资等。预计获得的效益包括：掌握英语知识、促进与西方国际的贸易、改善去英语国家留学的条件、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拓宽获得重要科技文献的渠道、提高生活水平等。

理性选择模式依靠中央政府实施语言规划，政府控制并协调理性决策。在非洲，这样的语言规划方式遭到学界的批判，他们认为政府参与的语言规划反映了欧洲中心论，对非洲的语言规划实践来说过于理想化，水土不服。发达国家的语言规划往往由政府主导实施，而非洲大多数语言规划工作由非政府机构负责。况且，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制定明晰的语言政策。大多数语言规划决策并非建立在充分了解社会语言状况基础之上，因而理性不足，实施策略往往临时起意（Deumert 2009: 384-385）。

理性选择模式并不一定产生理想的结果。语言规划很少完全遵照这一理想模式。正如Cooper在讨论语言规划的界定时指出，从长远来看，很难找到所谓系统、理性、理论驱动的语言规划；现实中的语言规划往往可能是一团乱麻，随意性大，受情绪左右（Cooper 1989: 41）。参与语言规划者除政府外，还有语言研究机构、教育部门、教会、语言协会、民间压力群体和个人。这些机构及个人认识水平及视角存在差异，很难使语言规划呈现出系统而理性的特征。因此，理性选择模式仅仅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

5. 结语

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它像所有研究动态变化系统的领域一样，必须顺应变化，不只是发现新现象和新问题，而是要根据新知识重新评价过去的做法和已有的理论。语言政策理论家和实施者不但要解释当前观察到的事实，而且要为那些希望解决冲突、提高交际效率且尊重语言变体者提供必要

的指导，正因如此，他们往往需要避免匆忙选择过于简单的模型和解决方案。学者们一般不会直接提出明确的建议，而是揭示理解语言政策、描写社会语言生态、认识众多相左观点、提出语言规划和管理方式等有关挑战的复杂性（Spolsky 2012: 15）。

当代社会进程有三大特点：全球化、迁徙和管理区域化。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理论模式无疑必须顺应时代的需求。虽然新的研究问题不断出现，但是老的问题依然还会受到关注。这些正是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 Bröckling, U., S. Krasmann & T. Lemke. 2011. From Foucault'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to studies of governmentality: An introduction [A]. In U. Bröckling, S. Krasmann & T. Lemke (eds.). *Government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C]. New York: Routledge. 1-33.
- Cenoz, J. & D. Gorter. 2012. Language policy in education: Additional languages [A].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 Cambridge: CUP. 301-320.
- Cooper, 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UP.
- De Korne, H. 2010.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Supporting community-controlled immersion in Canada and the US [J]. *Language Policy* 9: 115-141.
- Deumert, A. 2009.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 In R. Mesthrie, J. Swann, A. Deumert & W. Leap (eds.). *Introducing Sociolinguistics (2nd edition)* [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71-406.
- Fishman, J. (ed.). 1974. *Advances in Language Planning* [C]. The Hague: Mouton.
- Jernudd, B. & J. Nekvapil. 2012. History of the field: A sketch [A].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 Cambridge: CUP. 16-36.
- Mühlhäusler, P. 1996. *Linguistic Ecology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Region*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Nevalainen, T. & H. Raumolin-Brunberg. 2012.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Origins, motivations, and paradigms [A]. In J. Hernández-Campoy & J. Conde-Silvestre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C].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2-40.
- Phillipson, R. 1992/201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M]. Oxford: OUP.
- Skutnabb-Kangas, T. & T. McCarty. 2008. Key concept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histor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A]. In J. Cummins & N. Hornberger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ition), Volume 5: Bilingual Education* [C].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3-17.
- Spolsky, B. 2012. What is language policy [A].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 Cambridge: CUP. 3-15.
- Tollefson, J. 2008. Language planning in education [A]. In S. May & N. Hornberger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ition), Volume 1: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Education* [C].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3-14.

- Tollefson, J. 2011.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A]. In R. Mesthrie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C]. Cambridge: CUP. 357-376.
- Wright, L. 2004. Language and value: Towards accepting a richer linguistic ecology for South Africa [J].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8 (2):175-197.
- Wright, S. 2007.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A]. In C. Llamas, L. Mullany & P. Stockwel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64-172.

作者简介: 戴曼纯,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政策、二语习得、外语教学、句法学等。
电子邮箱: daimanchun@bfsu.edu.cn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学习感言

教育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郭龙生

提 要：迄今为止我国已出版多部研究各国语言政策的论文集、专著、译著等，作者认真研读梳理其能见到的如《各国推广本族语情况汇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政策研究》等论著，对这些论著的研究特色进行了分析、概括，指出我国目前语言政策及国别研究的现状特点，提出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并指出当前我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分析，作者指出我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未来发展趋势

1. 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

1.1 语言政策定义

所谓政策，就是国家或政党为了完成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具体行动准则。语言政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1) 语言政策，又称“语言规划学”。指政府、国家机构运用语言学理论为解决语言问题而确定方针、政策。包括确立或推广民族标准语，决定在教育、商业和技术等领域中以何种地区方言或外语作为通用的交际工具，以及决定采用哪种文字来作为书写和文学作品的手段等。广义地说，语言政策也包括语言计划及与此有关的语言问题。¹

(2) 语言政策，指国家或社会团体为语言的学习、使用、建设、发展而采取的态度和措施。语言政策是社会语言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它的范围涉及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各个方面。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语言政策是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它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问题等。²

(3) 语言政策，指国家或政府为语言的学习、使用、建设和发展而制定的方针、政策，涉及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各方面，包括确立和推广标准语，推行语言文字规范化，确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等。³

1 戚雨村、董达武、许以理、陈光磊，1993，《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459页。

2 陈海洋（主编），1991，《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第637页。

3 夏征农（主编），2003，《大辞海·语言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87页。

1.2 国别化研究

所谓国别化研究，就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进行的研究。1990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各国推广本族语情况汇编》一书，是我所知道的较早明确以国别视角研究语言推广政策的一本论文集。其中第一部分“西方各国推广本族语概况”对联邦德国、法国、苏联、日本、英国、美国等六个国家推广各自语言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与介绍。

2.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意义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与参考价值。

2.1 理论价值

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我国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曾经经历过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每当中外文化交流比较活跃的时候，也是语言文字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无论是谁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使西方的学术思想与科技成果进入了中国；也无论此前曾经有过多少次中外交流，学者们请进来、走出去，互相学习。总之，人们感到现在应该重新开阔视野，再次了解外面的世界，需要第二次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大千世界。

其次，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有比较才有鉴别。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不仅使我们的学者们了解国外的情况，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国别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再次，学科理论的探讨。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日益深入，促进了语言政策理论的探讨，促进了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培养。

2.2 现实意义

第一是汉语和外语研究队伍的结合。随着学术探讨的不断深入，学科壁垒不断打破，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有的学术传统也将逐步更新。汉语言研究队伍与外语研究队伍的结合，是语言学界近几年可喜的一个现象。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举办的历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外语界、汉语界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经常聚集在一起，为了感兴趣的议题共同切磋，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从目前可见的语言政策研究成果的作者角度来看，目前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人占比很大，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方面，这两支队伍正在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益于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制定的学术成果。

第二是政策制定的咨询。语言文字工作不是大局，但是关乎大局；语言文字工作不是中心，但是围绕中心。在目前这样的社会格局之中，作为语言文字工作

者，作为语言学者，我们的学术研究，都应该是为了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这样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此，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首先必须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制定，服务于制定科学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促进语言文字工作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服务于国家的大局与中心工作这样的终极目的。

第三是和谐生活的构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目前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政策的最新与最权威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两句话。在这样的根本政策指导下，借鉴、参考国外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将能够为构建健康的语言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提供有效的服务。

3.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中的问题

3.1 视野不够开阔

首先是外语语种比较少。目前，我国所有外语院校开设的外语语种总数量，可能不会超过100种。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成果中涉及到的国家数量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这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其次是关注范围不够广。常关注的国家主要就是那么几个，有一些重复建设。开拓创新，拓宽视野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统计这几本书中所涉及的国家，排除重叠之后的结果为57个国家、地区和组织。

表1 国内研究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

序号	书名	作者及出版信息	所涉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及名称
1	各国推广本族语情况汇编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	6个国家：联邦德国、法国、苏联、日本、英国、美国。
2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语文出版社，2001年。	113个国家：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阿拉伯、阿联酋、爱尔兰、奥地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基斯坦、巴林、巴拿马、巴西、保加利亚、贝宁、比利时、波兰、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朝鲜、达荷美 ¹ 、多哥、俄罗斯、厄瓜多尔、法国、法属圭亚那、菲律宾、芬兰、冈比亚、刚果、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哈萨克斯坦、海地、荷兰、洪都拉斯、几内亚、加拿大、加蓬、加泰罗尼亚、柬埔寨、捷克斯洛伐克、喀麦隆、

(待续)

1 1975年改名为贝宁人民共和国。

(续上表)

序号	书名	作者及出版信息	所涉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及名称
			卡塔尔、科特迪瓦、科威特、肯尼亚、老挝、黎巴嫩、利比亚、联邦德国、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卢旺达、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耳他、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美国、蒙古国、孟加拉国、秘鲁、缅甸、民主德国、摩洛哥、摩纳哥、纳米比亚、南斯拉夫、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塞内加尔、塞浦路斯、斯里兰卡、苏联、索马里、坦桑尼亚、突尼斯、土耳其、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乌干达、西班牙、西萨摩亚、希腊、象牙海岸 ¹ 、匈牙利、叙利亚、牙买加、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意大利、印度、英国、约旦、越南、赞比亚、扎伊尔、乍得、中非、中国。(其中有的只是列出了其宪法中的语言条款,真正涉及的只有23个国家)
3	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语文出版社,2003年。	22个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美国、秘鲁、墨西哥、南非、日本、瑞士、苏联、坦桑尼亚、土耳其、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以色列、英国、越南、中国。
4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	周玉忠、王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个国家:埃塞俄比亚、爱沙尼亚、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比利时、德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津巴布韦、老挝、美国、秘鲁、瑞士、土耳其、新加坡、新西兰、越南。
5	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	张西平、柳若梅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8个国家:德国、俄罗斯、法国、韩国、美国、日本、西班牙、英国。
6	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戴曼纯、刘润清等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0个国家和地区:爱沙尼亚、巴西、冰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俄罗斯、法国、黑山、加拿大、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美国、墨西哥、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
7	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	沈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个国家:韩国、日本、中国。

(待续)

1 1985年12月改名为科特迪瓦共和国。

(续上表)

序号	书名	作者及出版信息	所涉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及名称
8	外语政策研究	鲁子问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个国家和地区：荷兰、美国、欧洲。
9	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	张治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个国家：美国、中国。
10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外语与外语政策	赵蓉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个国家和组织：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亚太经合组织。

再次是翻译介绍难度大。

最后是社会认识跟不上。妄自尊大，盲目自信，落后的语言规范观念，导致整个社会对学习外来的新理论、新思想缺乏应有的接受心态，例如字母词问题的争论等。

3.2 借鉴效果有限

首先是领导重视不够。从国家层面，缺乏系统的外语规划，对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有些国家在语言政策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深刻教训，缺乏应有的关注。自1990年之后的十年之内，仅出版《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一本书，之后才陆续增多。

其次是缺乏统一战略。针对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国家事先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没有有意识地鼓励这方面研究的政策和措施。除了在2001年和2003年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和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组织编辑出版的两本大书之外，在“十一五”期间，国家语委才开始立项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戴曼纯、刘润清等2012)一书，就是该项目的直接成果。对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语言政策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完全靠个别学者自己的兴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再次是融会贯通不足。在目前可见到的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成果中，纯粹为了研究国外语言政策而研究的很多。这些成果对于研究针对的国家来说，倒是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这些研究大多仅限于介绍国外语言政策情况，分析研究政策出台的背景与社会效果等，但是缺乏对这种政策分析之后的融会贯通，缺乏通过这种分析之后对中国语言政策的观照。像张治国、王辉等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最后，成果有待转化。随着学者们对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日益关注，相应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但是，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我国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制定，为我国的语言规划服务，目前这方面的成果转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因此，学者们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宣传，让职能部门的领导尽快了解国际形势，采各国语言政策之长，为制定我国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4.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4.1 比较研究，效果会更加明显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研究对象国的情况。如果能够结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的语言政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指出中国语言政策的利弊得失，这样将会有效地促进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完善与贯彻落实，也将会有效地发挥语言文字政策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干预、调节与指导作用，使语言文字及其工作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团结统一，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4.2 反求诸己，政策将逐步完善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研究他国语言政策，比较我国语言政策的情况，反求诸己，即可看出我国语言政策与他国语言政策之间的优劣长短。结合我国的语言国情，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政策，制定新的政策等，都将促使我国语言政策的科学发展与完善，促进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与落实，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

5. 结语

李宇明在给王辉的《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一书写的前言中说：

王辉的论文使我……强烈感受到：我们需要研究世界。

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开放为“国际型”国家，国际型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世界。研究世界有远近两个目标：近目标是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更为宽阔的世界眼光来看中国，把中国现在的事情办好，把中国未来的事情计划好。远目标是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同国际社会一道把世界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随着我国的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中，国外这个大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得到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不管是近目标还是远目标，我们对世界语言生活状况的了解都是远远不够的。全面研究世界的语言生活，窃以为起码应包括如下内容：1. 每个国家

(地区) 语言的种类、每种语言的基本面貌与使用活力; 2. 每个国家(地区) 的语言政策(包括外语政策) 及其执行力; 3. 向外传播本国语言的经验与举措; 4. 语言规划的机构、运作与学科发展状况; 5. 国际组织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状况。这些研究成果起码可以出版两套大型丛书: 国别(包括国际组织) 语言生活状况丛书;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¹

当然, 出书不是终极目的。语言政策国别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利用研究成果服务于我国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 服务于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与教育工作大局, 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和建成小康社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 张治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海洋(主编), 1991,《中国语言学大辞典》[Z]。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戴曼纯、刘润清等, 2012,《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90,《各国推广本族语情况汇编》[C]。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鲁子问等, 2012,《外语政策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戚雨村、董达武、许以理、陈光磊, 1993,《语言学百科词典》[Z]。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沈 骑, 2012,《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苏·赖特, 2012,《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 陈新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 辉, 2010,《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夏征农(主编), 2003,《大辞海·语言学卷》[Z]。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张西平、柳若梅(编), 2008,《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C]。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张治国, 2012,《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 2001,《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C]。北京: 语文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 2003,《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C]。北京: 语文出版社。
- 周玉忠(主编), 2011,《美国语言政策研究》[C]。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¹ 王辉, 2010,《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页。

周玉忠、王辉（主编），2004，《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郭龙生，博士，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语言规划、媒体语言研究。电子邮箱：qinglongyizhu@263.net

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中 四个术语的辨析*

张治国

提 要: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LPLP) 是一个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 甚至连其学科的名称都存在几种表达形式, 即“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另外, 中外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内涵上存在稍许不同的理解。本文根据 LPLP 的发展沿革以及中外不同语言文化背景来辨析这四个术语, 并以定量的方法验证了本文的观点, 最后, 文章就这四个术语的使用问题指出当下较为妥当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 术语辨析;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1. 引言

以色列著名的语言政策研究专家斯波斯基 (2011: vii) 指出: “语言政策的研究至少有 50 年的历史, 特别是近 20 年来, 人们对语言政策的兴趣日益增大, 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是, 学界对该领域的某些研究范畴、研究性质、理论基础和专业术语等均尚无定论”。诚然,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LPLP) 是一个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 甚至连其学科的名称都存在至少以下四种常用的表达形式: “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 “语言政策” (language policy)、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以及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中国在语言文化和学科发展两方面都与国外的情况不尽相同, 致使中外在上述四个术语的内涵和感情色彩两方面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本文结合时间和地域两个维度对上述四个术语进行辨析, 以便对它们有一个更统一的理解和使用, 更有利于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学术交流。

2. 术语辨析

2.1 国外情况

2.1.1 LPLP 发展的沿革与术语嬗变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的 Ricento (2000) 把 LPLP 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 (见表 1)。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与周边国家语言互联互通建设的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14BYY045) 和上海海事大学科研基金项目“语言管理”(项目编号: 20130451) 的资助。

表1 LPLP的发展历程表

阶段	内容		
	宏观社会政治	方法论	策略
第一阶段（1950—1970年早期）	脱离殖民统治、建立新兴国家	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	语言问题可以通过规划来解决
第二阶段（1970早期—1980年晚期）	遭遇现代化失败	社会语言学中的批判理论	现实主义
第三阶段（1980年晚期—现在）	构建世界新秩序	后现代主义	语言人权

20世纪50至60年代，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满怀信心制定自己国家的语言规划，社会语言学家也开始重视语言规划的研究。“语言规划”一词最早是波兰裔美国语言学家 Weinreich 于1957年提出来的。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 Haugen 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语言规划”的概念。“语言规划”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术语，那时殖民主义已经终结，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为自己将来步入现代化进程而进行各种“规划”（Spolsky 2009: 4）。不少国家把语言规划工作视为一项工程，故语言规划也曾叫“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1969年，Ferguson, Fishman 和 Das Gupta 等先驱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Rubin & Jernudd 1971），标志着语言规划成了一门正式的学科，归属于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外出现了语言规划研究的高潮。

但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许多国家原先制定的语言规划纷纷表现出失败的迹象。例如，印度独立后制定的语言规划内容之一是15年后印度将用印地语代替英语，但后来却发现英语在印度的使用难以取消。再如，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时制定的语言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纷纷表现出失败的迹象——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还在使用前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人们对此前阶段的语言规划行为的评价众说纷纭，难以说清（Rubin, Jernudd, Gas Gupta, Fishman & Ferguson 1977），但人们普遍认为“语言规划”收效甚微，语言规划的研究进入了低谷期（即LPLP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序幕拉开，国际形势的变化又使各国（包括新独立的国家）开始重视规划各自国家的语言。人们对“语言政策”的研究兴趣开始复苏（Tollefson & Tsui 2004: vii），LPLP 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但此时人们“更喜欢使用具有中性色彩的‘语言政策’一词”（Spolsky 2000: 66）。

2.1.2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辨析

在国外，“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只是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时尚，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若要说它们之间有差别，那就在于它

们的兴起时间稍有不同，社会语言学家使用它们的感情色彩稍有差异。“语言规划”主要用于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语言政策”则主要用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后。“语言规划”有失败的联想，而“语言政策”则是一个中性词。不过，国外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有区别，如Ager (2001)认为，“语言规划”是指个人或集体所从事的非官方活动，而“语言政策”是指官方行为。

不可否认，“规划”和“政策”显然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中外皆然。“规划”是为达到目的而经历的一个过程，是成长的蓝图和发展的路径。“规划”可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种，国家、单位和个人似乎都可以进行“规划”，而政策好像往往是国家或集体的事情。此外，“规划”与“预测”(forecasting)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规划”是预告未来应该怎样，具有主动性。而“预测”是预告未来将会怎样，具有被动性。“政策”是指具体的指导方针，是对决策和行动的某种鼓励或限制，为决策者的行动设定活动范围。因此，当我们在理解“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时，不能像在做算术题一样把这两个术语的区别简化为“规划”与“政策”的区别，否则，我们会进入一个悖论：一方面，“规划”不同于“政策”，另一方面，“语言规划”却相当于“语言政策”。所以，我们应该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视为两个整体，它们在学科的表达中大同小异或基本相同。

2.1.3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辨析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两个术语也是一样的意思。差别在于前者是把“语言规划”放前，“语言政策”置后，原因可能是出于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个术语出现时序的考虑；后者是把“语言政策”放前，“语言规划”置后，原因可能是出于对这两个术语时下重要性的考虑。不过，相比之下，在国外，使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现象比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现象似乎更多些。

此外，有些学者喜欢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分别简称为“语言规划和政策”(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与“语言政策和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英语都缩略为LPP。

2.1.4 “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辨析

由于在LPLP的发展历程上先后流行过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术语，这容易使人误解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再说，也有一些人至今还坚持使用“语言规划”一词，有的人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之间存在一些差别。因此，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个术语合在一起就解决了上述问题：在时间上没有割断学科的发展，在内容上包含了各种观点。

2.2 国内的使用情况

2.2.1 LPLP发展的沿革与术语嬗变

尽管我国早在秦朝就有“书同文”的语言规划行为，但是，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零星地介绍一些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此时，国外已经开始流行使用“语言政策”一词了。因此，我国学界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个术语在流行时间上的差别不清楚，而且，对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2.2.2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在中国也叫“语言计划”，或“语文建设”。“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陈章太2005：2）。“语言政策”是政府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发展和使用所作的行政规定（陈章太2005：148）。由此可见，中国学者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视为两个不同的术语。

至于它们两者的关系，中国存在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语言规划在先，语言政策在后，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例如，苏金智（2004）认为，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另一派认为语言政策在先，语言规划在后，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例如，陈章太（2005：2）指出：“语言政策是基础、核心，是行政行为；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延伸与体现，语言规划的理论又可以为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语言规划既是政府行为，又是社会行为。”于根元（2004：41—42）认为，语言规划的内容之一是贯彻执行语言政策。政府从社会或自身的需要等出发，确定自己的语言政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语言进行规划。因此，语言政策对语言规划有直接的影响，语言规划通常是某种语言政策的体现。同时，语言政策的提出也要以语言规划的理论为基础，否则，语言政策将无法实行。语言政策是由政府来完成，语言规划可以是由政府来承担，也可以由官方的或权威的学术机构或个人来实施。

2.2.3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在中国，这两个术语的并用既整合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两个术语的内容，又可以与国际接轨。因此，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后者的使用似乎显得多些。

另外，有些人也使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这个问题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英语的“and”可以译为中文的“和”或“与”。一般而言，中文的“与”比较书面化，“和”比较口语化。但是，现代汉语中，“和”也可以进入正式的书面语中，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而且，若使用“与”字，这两个术语就会分别出现三个“yu”音（语、与、语），这使读者和听者都觉得有些拗口。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在这两个术语中选择“和”字显得好一些。另外，也有人在这两个术语的缩略形式上使用“及”字代替“和”字，即“语言规划及政策”、“语言政策及规划”。

3. 辨析验证

3.1 国外“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在时间和内容维度上的异与同

尽管我们把LPLP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但各阶段的分界点是个模糊的概念。为了便于统计，本文暂以1990年为分界点，通过如下三个例子来分析“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个术语的使用情况。

第一，以定义为语料。刘海涛（2006）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的一文中列举了33个中外不同时期的学者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定义。这些定义的用词可以反映出LPLP学科的发展阶段。虽然刘海涛在文中说，他对这两个术语“不做进一步的区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定义就会发现：1990年之前的定义都是选用“语言规划”一词，但是，1990年之后的定义却开始出现了“语言政策”一词。

第二，以期刊为语料。本人对《语言政策》（2002年创刊）与《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1977年创刊）两本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题目进行统计后（见表2）发现：在2002年至2009年《语言政策》所刊论文的题目中，使用“语言规划”的文章只有11篇，而使用“语言政策”的文章却有41篇。从1977至1989年在《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所刊论文的题目中，使用“语言规划”的文章有18篇，而使用“语言政策”的文章却只有9篇，两者的比例是2:1。从1990至2010年5月在该期刊所刊论文的题目中，使用“语言规划”的文章有27篇，而使用“语言政策”的文章却达24篇，两者的比例基本上是1比1。可见，如下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语言规划”一词在国外主要用于20世纪90年代前，而“语言政策”一词主要用于20世纪90年代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术语的文章篇数相当。这主要是该杂志的名称就含有“语言规划”一词，不能排除有些投稿者为了便于发表而投其所好的可能。即使没有这种可能，以上数据也足以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言政策”一词使用频率不断上升。

表2 两种学术期刊中四个术语的使用统计

术语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1990前	1990后	1990前	1990后	1990前	1990后	1990前	1990后
时间段								

（待续）

(续上表)

术语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NA		NA		NA		NA	
《语言政策》	NA	11	NA	41	NA	0	NA	1
《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	18	27	9	24	0	3	1	0

注：NA表示该杂志在1990年前尚未问世，故无相关文章。

第三，以专著为语料。本人对Spolsky (2004)《语言政策》专著后面的参考文献（包括专著和文章）中有关这些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过统计（见表3），结果如下：1990年前使用“语言规划”术语的文献有9部/篇，使用“语言政策”术语的文献有3部/篇，两者的比例是3：1。1990年后使用“语言规划”术语的文献有8部/篇，使用“语言政策”术语的文献有19部/篇，两者的比例是1：2.4。这再次印证，1990年后，LPLP学界使用“语言政策”术语的人在增多，而使用“语言规划”术语的人在减少。

表3 《语言政策》专著参考书目中四个术语的使用统计

术语	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1990年前	9	3	0	0
1990年后	8	19	0	2

3.2 国内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使用多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使用

国内外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使用差异小于“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差异。例如，刘海涛（2006）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的一文中，时而使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时而使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显然，他把这两者完全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再如，表2显示，使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文章有3篇，而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只有1篇。而表3显示，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文献有2部/篇，使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文献有0部/篇。但表2和表3有一点比较一致，即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主要出现在1990年之后。

不过，在正式场合中使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似乎多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例如，世界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在其网站上指出其研究范围包括“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在其学术会议上也是使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2007、2008和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也是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它指出我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一直是语言学中的薄弱环节”。不过，国内外使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只是例子少些。例如，Ager（2001）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中的动机研究》，陈平和Gottlieb（Chen & Gottlieb 2001）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东亚视角》。

4. 结论

总体而言，“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可以被视为同义词。但是，我们在接触这些术语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尊重作者在书刊等方面的选择。第二，我们在理解和使用这些术语时应该考虑到时间因素与它们的关系。第三，在涉及国际交流或国际比较的时候，我们最好使用“语言政策”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术语和排序，以便与国际上的主要使用趋势接轨。第四，鉴于中国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两个术语具有较大的内涵差异，在论述中国特有的情况时我们可以保留中国特色。但使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是最好的选择，可以消除中外之间的表达差异。

参考文献

- Ager, D. 2001.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M]. Clevedon, England and Buffalo, US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Chen, Ping & N. Gottlieb (eds.). 2001.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C].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Rubin, J. & B. Jernudd (eds.). 1971.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Developing Nations* [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ubin, J., B. Jernudd, J. Das Gupta, J. Fishman & C. Ferguson. 1977. *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 [M]. The Hague: Mouton.
- Spolsky, B. 2000. *Sociolinguis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M]. Cambridge: CUP.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M]. Cambridge: CUP.
- Tollefson, J. & Tsui, A. B. M. 2004. *Medium of Instruction Policies: Which Agenda? Whose Agenda?* [M]. NJ: Lawrence Erlbaum.
- Zajda, J. 1989. Education and policy: Changing paradigm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48 (1/2): 67-91.
-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语言政策: 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 张治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陈章太, 2005, 《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海涛, 2006,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A]。载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编), 《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 语文出版社。55-60。
- 苏金智, 2004, 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Z]。武汉: 江汉大学学术报告会。
- 于根元, 2004, 《应用语言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张治国, 博士,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社会语言学(尤其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法国多语制政策的战略意义 与意识形态冲突

上饶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李清清

提 要：法国语言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早期严苛的法语单语制转向相对宽松的多语制的发展过程。这种转向表面上看似法国已经彻底改变了其严苛单语制时期的法语民族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但分析发现，这种转向的背后不仅充斥着诸多矛盾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且法国大革命“一国、一族、一语”的雅各宾主义政治思想始终并未真正改变。这既表明法国多语制政策转向的不一致性，更深刻揭示了其政策转向的战略意义，其本质是法国应对国内外多语多文化诉求的一种政治姿态。

关键词：法语语言政策；雅各宾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语言推广；多语制

1. 引言

法语是法国唯一的官方语言¹，普及率高达92%²。法语还是世界上第二重要的国际语言，是联合国、欧盟、国际奥委会等诸多世界组织的重要工作语言。然而，它现有的地位并不是偶然随机的发展结果，而是长达5个世纪的一系列语言立法和教育政策努力下的产物（Judge 2007: 9）。自1539年签署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涉及语言的重要法律文件“维莱哥特雷法令”（*Edicts of Villers-Cotterets*）以来³，独尊法语的严苛单语制一直是法国语言政策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法语成为同化教育的主要工具。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出台了消灭方言和其他语言的政策。期间代表人物格莱戈瓦教士（Henri Grégoire）1794年3月28日在国民大会上宣读《消灭方言的必要性及手段与普及和使用法语的报告》，声称政治上领先的法国在语言方面还一片混乱；在当时全国人口中法语为母语者仅占12%；他提出必须强制学习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外国语言政策国别研究”（项目编号：10JJD740013）的阶段性成果。

1 早在1999年，法国语言学家贝尔南·塞尔吉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受法国政府委托调查语言国情，以此作为政府是否可以签署《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的预备文件。该语言国情报告指出，除标准法语之外，法国境内还有24种“其他语言”（other languages）。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量移民人群所带来的移民族群语言，法国称之为“非疆域语言”（non-territory languages），实指“非本土语言”。

2 这一数据包括5岁之前即已接触法语的法国儿童。如果仅以18岁以上成年人的语言使用为计算标准，法国的法语母语人数比例也高达总人口的86%。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guages_of_France（2012年10月12日读取）。

3 该法令第111条规定，法语是国家活动主要领域的官方语言，一切法律文件、法庭判决和口头陈述等都必须使用法语，禁止继续使用拉丁语和国内区域语言。

法语、清除方言。格莱戈瓦的报告敦促政府出台了两项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及学校只许讲法语（戴曼纯、贺战茹 2010）。

长久以来，法国以平等之名对内将区域语言排除在公共领域和教育范围之外，对外亦以文明使命之名大力推广法语，在世界范围内排挤其他语言。但是，随着英语国际地位的迅速攀升以及欧共体的筹建¹，法国社会因 1964 年《您说法语吗》一书的出版拉响了法语危机和保卫法语的警笛。面对英语的强势威胁和传统解决机制的失效，法国政府渐渐改变其原有的显性法语推广策略和严苛单语制政策（Judge 2007: 29），多语制自此进入了法国语言政策的考量范围。

然而，法国语言政策从最初严苛的单语制向宽松多语制的转向实际上表里不一，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充斥着诸多的矛盾冲突。究其本质，这一表面上的政策转向并未从根本上颠覆法国自大革命时期以来始终信奉的“一国、一族、一语”这一民族国家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政治思想，其真正意图是应对英语全球化引发的国内外巨大挑战，转向隐性推广法语的巧妙战略调整。

2. 雅各宾主义：一国、一族、一语

“一国、一族、一语”的语言民族主义原则对于多数法国人而言似乎不言自明（Judge 2001: 44）。这一理念扎根国民应当归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来盛行的雅各宾主义政治思想。法国主流的语言理念和政策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政权时期。法语自 1539 年“维莱哥特雷法令”的颁布和 1635 年法兰西学院的建立²以来一直充当着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工具（Ager 1996: 40-41），只是在大革命推翻封建王权后，法语服务的政权转变为一种基于立宪制和共同语言的新型民族国家。

受启蒙思想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影响，大革命初期首先夺取宫廷政权而占统治地位的革命党吉伦特派（Girondins）³崇尚“自由”理念，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赋予各地区自由发展的权利和自由，从而青睐政体上的联邦制和语言上的多语制。然而，1793 年推翻吉伦特派统治的雅各宾派（Jacobins）⁴坚信只有在“平等”基础上才能建构民主，推崇一种基于绝对平等的极端民主形式的雅各宾主义思想（Judge 2002: 36）。这一政治思想的语言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ies）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总称。1951 年，法、意、联邦德国、荷、比、卢 6 国签订了为期 50 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6 国外长又于 1957 年签订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1965 年，6 国再次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大共同体统称为欧洲共同体。

2 法国首相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倡议成立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专门负责法语的标准化和词典编撰工作。

3 吉伦特派，原称布里索派（Brissotin）。指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波旁王朝继而掌握实权的共和派，因其中很多人原是吉伦特省人，因而被称为吉伦特派。

4 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1793 年 6 月 2 日，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通过救国委员会实行雅各宾专政。1794 年 7 月 27 日的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政权。

崇尚“一国、一族、一语”的语言民族主义原则和法语至高地位超越一切其他语言的思想。

法语的“民族”一词(nation)源自意指“出生”的拉丁语“natus”，法国法律将“民族”定义为一个由同一宪法管理的个体组成的具有主权地位的独立法律实体(Petit Larousse 1972, 转引自Judge 2001: 45)。如此一来, 尽管“国家”和“民族”在政治和社会学中属于不同的概念, 但在法国的法律中却成为同义词, “国家”因而等同于“民族”。正因为如此, 《杜邦法》的法语事务咨询专家伊夫·马雷克(Marek 1998: 346-348)明确指出, 法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给任何基于某特殊属性建立的群体赋予任何权利, 因为如果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 就必须将他们与其他民众乃至整个国家分裂开来, 从根本上破坏了“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时任右翼总统萨科齐也仍然宣称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她不是一个民族, 也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转引自张金玲 2010: 84)。因此, 法国始终强调所有法国人绝对平等, 法国不存在任何官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 甚至连任何承认少数民族概念或权利的行为都违背了法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所谓的绝对平等实际上剥夺了少数族裔原有的特质, 包括其语言和文化。

正因为语言上的歧义是妨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原因, 雅各宾主义确立了“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需要一门统一的语言”这一基本原则(Calvet 1998: 319)。民主的最佳标记就是全国民众都使用巴黎精英的标准法语, 从而开启了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扬国语灭方言”的语言政策。使用法语成为一种高尚的爱国行为, 而使用“土语”(patois)¹则等同于反革命的旧思想和叛国行为(Ager 1996: 42)²。1881年的《费里法》³则从教育上真正实现了雅各宾主义的“法语化政策”目标⁴。自此, 法语成为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国家象征, 更是国家统一的固化剂⁵。“一国、一族、一语”的基本原则顺利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基柱, 而这一“语言原则对我们(法国)而言就如同共和国法律一般重要”(Frey & Frey 1995: 505)。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 区域语言沦为社会流动和机会的障碍, 区域语言及其使用者甚至被视作威胁法国统一的巨大隐患。正如前法国总统蓬皮杜1972年所言, “法国绝无使用区域语言的余地”(Ager 1996: 43)。为了严禁使用区域语言这

1 “patois”一词在法语中是带有极端贬义的词语, 是指任何一种不是标准法语的语言或方言, 就连非标准的法语也是一种必须严禁的土语。

2 1794年, 大革命时期救国委员会成员贝尔特朗·巴莱尔(Bertrand Barère)宣称, “所有腐朽的方言是封建思想的最后残留, 必须加以清除”, 因为只有“封建主义和迷信思想的人说布列塔尼亚语”、只有“宗教狂热的人说巴斯克语”。布列塔尼亚语和巴斯克语都是法国境内重要的区域语言。参见Ager(1996: 42)。

3 《费里法》规定全国必须使用统一通俗化的法语教学大纲, 要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文化。参见Mendel(2004)。

4 法语化政策(francisation, 有时译为Frenchification), 是指使不会说法语的人学会法语的过程, 或指使非法语使用区域的领土、制度、道德观念和风俗变成法国式的过程。参见Schiffman(1996: 290)。

5 “固化剂”(cement)一词同样也是法语意识形态中的特色词汇, 反复出现于法国多种官方或非官方文件。

种“违法”的行为，学校发动学生相互揭发，甚至逼迫违法者佩戴一个誉为“le symbole”的特殊标牌或头戴笨蛋高帽以示惩罚¹。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单语教育政策下，区域语言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使用价值，民众普遍对自己低级的土语深感耻辱，甚至纷纷“乞求要从土语中解放出来”（Judge 2001: 73）。

雅各宾主义思想除了牢固树立起法国语言民族主义的原则之外，还成功建构了法语地位超越一切语言的强势话语。法国关于法语具有“理性”、“简洁”、“纯洁”、“普世性”和“人文价值”等优秀品质的颂歌历来不绝于耳²。正如1784年著名法国作家里瓦罗尔赞颂道³，“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够比我们的语言在表达上更加纯净和明晰，（法语是）一种更能拒绝模糊性和所有歧义的语言，一种更为理性但又更加温柔、更能够适应各种风格的语言，一种表达上更加坚贞、描述上更加明智的语言，一种崇尚优雅和修饰却更加反对虚假的语言”（Wardhaugh 1987: 100-101）。与此同时，法语又因自身的精确性和逻辑性上升为一种普世的语言，法国及其子民从而与生俱来肩负着将法语和法国文化传播于世的“文明使命”⁴。正因为如此，任何传播和教授法语的行为都是在履行文明使命的天职，法语的对内对外传播也由此披上了一层神秘且神圣的外衣。

时至今日，雅各宾主义的中央集权式单语意识形态并未有实质性改变，正如2007年萨科奇总统竞选所言，“我定当保卫法语，我敢说法语是所有人类的财富，是将我国文化影响力传播到全世界的工具”（Nolan 2011: 92），这一语言文化秉性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法国社会（Blanchet 1992: 72，转引自Ager 1999: 28）。法语作为法国政治和文化统一、普世价值和人民绝对平等理念的理想表达和主要实现手段，雅各宾派“一国、一族、一语”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始终是法国对内对外语言政策的核心思想。

3. 语言政策的多语制转向

迫于战后国内外的多重压力，虽然戴高乐政府仍然意在坚持推广地方语言最终会危害法语地位和国家统一的主导思想（Safran 1989: 144-147），但之后的法国政府只得改弦易辙，逐渐从原来严苛的雅各宾主义的法语单语制转向对多元化相对更开放和宽松的政策。

1 笨蛋高帽是指法国旧时学校里违反法语使用的学生必须带的一种圆锥形纸帽，是法国严苛法语教育的惩罚方式之一。

2 关于历史上法国内外对法语品质的称颂描述，参见Gordon (1978: 1-7)。

3 里瓦罗尔（Rivarol）凭借《关于法语语言的普世性》（*Discourse 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French Language*）获得柏林学院奖，标志着法语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里瓦罗尔也成为称颂法语至高地位的代表人物。

4 法国坚信，法语和法国文化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世界上所有人可以而且应该拥有的普世价值，这一文明使命要求法语及其文化就像闪耀的光芒一样照耀着其他语言和文化，使之能够目睹到法国和法语的无限荣耀。

战后的国际独立浪潮激起了法国国内长期语言压迫下的地方主义抬头，使法国区域性族群开始认识到他们及其语言沦为了“内部殖民”形式的牺牲品（Safran 1992: 400）。迫于这一内部压力的释放，法国不得不颁布“允许教师在初级和学前教育中使用当地语言”的《戴克索纳法》，这成为法国大革命之后第一部允许区域语言进入课堂的法律（Judge 2007: 125）。但直到2008年颁布《宪法修正案》，法国才正式承认“法国的方言属于法国的文化遗产”（第75条）中的多语国情和区域语言地位。

真正对法国语言政策多语制转向产生根本性作用的还是战后英语在国际和欧盟多层面上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与挑战。面对英语及其文化的威胁，法国的第一应对策略是随即对法语及其文化展开军事般的捍卫行动。1992年6月25日《宪法修正案》新增“法兰西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的语言条款即是这一捍卫法语行动的最好诠释¹。然而，面对新形势下的国内外多语及多文化诉求，法国这一传统的显性保卫和推广法语的强势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法国所面临的“法语危机”（Adamson 2007），法国政府1994年推出的《杜邦法》才真正标志着法国语言政策从本质上推崇显性法语推广的雅各宾主义转向了更偏向吉伦特派的多语制思想（Judge 2002: 106）。虽然1994年8月4日通过的《杜邦法》旨在强制规定法语使用的领域并加大对法语使用行为违法的惩罚力度²，但它同时要求公共机构的所有标识语除法语外还应同时具备“两种以上的”译文（第4条），并规定“掌握法语语言和具备其他两门语言的知识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第2部分第11条），这充分响应了欧盟所有学生应该学习两门以上外语的政策要求。此外，第21条表示不会以任何方式歧视区域语言，也不会以任何理由反对区域语言的使用。

因此，《杜邦法》本身是一个强化法语意识和提倡多语制的矛盾结合体。这一法律的实施极大促进了法国外语语种多元化的发展，使得法国自我标榜为世界推广语言多样性的先锋和小族语言与文化的捍卫者（Shelly 1999: 312）。这一语言政策的转向无疑促成法国在国际上占据一个有利的道德制高点，为应对英语的强势扩散、加强法语的推广赢得相对的时间和空间。

1 虽然语言条款入宪只是一种确立法语官方地位的象征性行为，但它的通过正好发生在《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开始公开签署的时候，这无疑揭示了法国的双重政治目的。其一是法国试图凭借欧盟的语言平等原则和法国的宪法条款来防范英语成为欧盟主要或唯一的工作语言，从而保护法语在欧盟教育、文化和语言政策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其二是防止欧盟等国际社会要求法国在更大程度上承认其区域语言和多样性的现实（吴锡德 2002）。

2 《杜邦法》规定：在消费者保护、就业、教育、广播电视以及法国境内所有学术研讨会五大领域均必须使用法语，同时，该法案还加重对不遵循法语使用行为的惩罚力度，规定“违反规定者，自然人罚款五千法郎，法人二万五千法郎”，甚至送进监狱，致使法国产生了所谓的“语言警察”（police du langage）。自1995年9月15日实施以来，到2006年法语和法国境内语言总司总计审查了10,923起违法的商业案件。参见 Ager（2008）。

4. 政策转向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矛盾

法国始终坚信推广法语有利于维护法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但迫于当今国际国内的重重压力，法国不得不转向一种新型的多语制政策。然而，这一政策转向背后却充斥着种种意识形态矛盾，深刻反映出法国在欧盟和国内推广语言多样性和保卫法语之间的内在矛盾，也揭示了法国雅各宾主义的语言意识形态至今仍未发生本质改变。

4.1 欧盟：推广多样性和保卫法语的矛盾

法国推广多语制与保卫法语间的深刻矛盾在欧盟舞台上时常鲜活上演，其法语崇高性的言论亦不时跃入眼帘。

早在英国加入欧盟的初期¹，法国在1979年成立保卫法语组织的目标中宣称，法国要“发展欧盟内所有国家的所有欧洲语言，绝不会偏睐英语”，力图向欧盟展示法国推行多语制的决心。然而，问题是，同作为海外文化机构成员的欧洲语言委员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却依然高唱法语独尊的主流论调，坚持欧盟的“官方语言只可能是法语”的观点（Oakes 2002）。发展至今，法国海外文化传播网络已经囊括了164个使（领）馆文化处（组）、142个文化中心和法兰西文化交流学院以及1040个法语联盟。这一庞大的机构体系无疑充分展示了法国力图在多语国际社会中推广法语及其文化的决心和魄力。

推广法语、削弱其他欧盟国家官方语言地位的心理在法国政府同样非常普遍。1994年12月，正当法国准备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法国欧洲事务部部长即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工作语言数量的提案（分别为英、法、德、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法国虽以解决欧盟机构高效交流为名目提出该案，但本质而言自然是法国为维护法语优势地位而展开的一项政治斗争（Calvet 1998: 312）。

最能说明法国语言政策表里不一的事实是，当2004年欧盟语言改革提出所有文件草案只以草案的起草语言流通的时候，法国政府断然否决，因为当时55%的文件草案使用英语，而只有44%使用法语。法国在其中的态度反差无疑清晰揭露出法国推广多语制的不一致性，因为法国只有在保证了法语绝对利益的基础上才会有意愿做出推广语言多样性的努力和姿态（Oakes 2002）。正因如此，1998年法国倡议每位欧盟学生应该在母语之外学习至少两门外语（即“M+2”语言模式）²，促使欧洲首脑峰会将之推为一项全欧盟项目，从而凭借欧盟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地保障法语的地位。毫无疑问，如果每人只须学习一门外语，那显然都会选择英

1 1973年，英国和爱尔兰这两个英语国家加入欧盟（当时还称为欧共体）。这一历史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法语在欧共体原先享有的统治地位。

2 其中，“M”代表欧洲公民的母语，“2”代表每位欧洲公民应该学习两门以上的外语。这是欧盟要求每位欧洲公民所应达到的基本语言能力目标。

语，但“M+2”模式却能有效维护和提升法语现有的第二外语地位，因为法国政府清醒认识到，法语在欧盟中的地位对于法语的国际地位发展而言具有战略性的象征地位。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在其1995年的著述中所指出的那样，“法语的未来取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如果明天因为英法语言的距离持续扩大，英语成为唯一的工作语言，那我们还如何能在国际舞台上保卫法语的地位？”（Calvet 1998: 312-313）。

法国致力于推广法语的决心从其不遗余力地为欧盟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法语培训的热情中亦可一览无遗。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法语国家国际组织（OIF）共为来自24个欧洲国家的60,000名公务员和外交官提供了免费的法语培训课程（Diplomatie 2012）。目前这一针对欧洲官员、记者和公务员的免费法语培训项目更是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更为重要的是，法国1998年还颁布了《法国人在欧洲机构》指南，明确要求所有法国人在与欧盟机构接触的时候都必须使用法语。时至2009年，法国合作与法语国家事务部秘书阿兰·若昂岱仍在《在全世界推广法语》战略文件中明确强调，法语的推广能够促进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决保卫的使命（Diplomatie 2009）。

面对这一系列事实，法国推广语言文化多样性“先锋”形象的虚伪本质不禁让学者雪莱（Shelly 1999: 315）反问道：法语保卫者在谴责以英语为媒介的文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同质化效应的同时，是否仍有理由以传播其普世价值为由而大力推广法语呢？因为事实上这种力推法语为交际通用语和发展语言多样性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是难以调和的（Wright 2006: 45）。

4.2 国内：保卫法语和支持区域语言的矛盾

毫无疑问，“要想在（欧盟多语教育）中取得领先地位，法国就必须做好表率作用”（Oakes 2002: 376），法国近年因而不断颁布支持多语制的法律条令，尤其是2008年《宪法》正式承认区域语言的官方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语言的发展。然而，这一过程缓慢而又艰辛，实效不容乐观，均清晰揭示了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立场及其背后潜藏的深层语言意识形态矛盾。

2008年法国国会举行宪法修正案联席会议，试图增加“区域语言属于法国遗产”条款，但这一草案遭到法兰西学院40位终生院士的强烈反对，指责任何在宪法中承认区域语言的行为都是对法国国族认同的攻击¹。显然，这一关于法语和区域语言的雅各宾主义语言思想又丝毫未变地公然浮出水面。面对新形势下的内外压力，法国参议院最终以2比1否决了法兰西学院的的抗议，力排众议在宪法中承认区域语言的官方地位。

¹ 参见《卫报》2008年6月16日题为“法国议会承认地方语言惹怒了法兰西学院”（French Parliament's recognition of local languages angers French Academy）的报道。

事实上,1992年法语条款的入宪即已埋下了区域语言在法国难以享有官方地位的伏笔,这也正是为何法国至今不肯批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的真正原因。虽然法国在1999年经过多番论证并对该宪章附加长达多页的解释文件之后才愿意签署该宪章的部分条款,但宪法委员会最终仍以违背宪法语言条款为由否决该宪章的实施。正如布列特尼亚语言办公室主任菲利普·贾克(Philippe Jacq)所指出的,法国承认区域语言地位的宪法调整还仅仅是一小步,签署欧洲语言宪章才能真正赋予区域语言应有的法律地位(Chrisafis 2008)。因此,这一多语制语言政策下法语和区域语言的矛盾充分揭示了“单语制的语言意识形态在当今法国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Nolan 2011: 93)。

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对于区域语言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还仅仅是象征性的,区域语言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外语”学科定位颇令人反思。在法国,区域语言归属于现代外语教育体系,而非国内语言教育系统,在法国教学体制中的学科地位与普通外语相似(戴冬梅 2010)。《语言多姿多彩的欧洲》项目数据显示¹,法国小学生可从8种外语和7种区域语言自主选择其一作为个人的第一外语,此时近99.9%的小学生选择英语。到11-15岁的中学阶段,学生必须从19种现代外语和11种区域语言中选择第二门外语²,而政府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区域语言或现代外语作为外语语种,学生的第二外语选择通常依次为西班牙语和德语。可见,法国学生的外语组合普遍都以“英语+西班牙语”为主,区域语言往往难入其中。因此,区域语言沦落到须与现代外语如英语展开激烈竞争才能获得生源,且类似于外语的境地。这种外语语种多元化机制致使很多学生根本不会选择学习区域语言,因为它在和普通外语的实际竞争中只会处于劣势。法国学校2000-2001学年的选学外语情况数据即可揭示区域语言完全失利的局面。在该学年度,法国只有1.5%的小学生选择区域语言,而中学生青睐区域语言的则不足0.3%(Sabatier 2003, 转引自Helot 2003),而2008年全国选择使用区域语言参加国家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总数亦仅有6000人³。

虽然法国将区域语言纳入现代外语教育体系的做法称为:法国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外语教育的多元化,是使方言、小语种得以延续的必经之路(戴冬梅 2010),但其实质仍是拒绝承认区域语言的合法地位,将其视为一种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外来语言。这种表面上为维护法国多语制积极形象而推行的多语种外语教育政

1 参见官方网站(Language Rich Europe): <http://www.language-rich.eu/home/country-profiles/profiles-overview/france.html> (2013年10月5日读取)。

2 11种区域语言分别为:巴斯克语、布列塔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科西嘉语、克里奥语、高卢语、美拉尼西亚诸语言、阿尔萨斯语、摩泽尔语、奥克语和大溪地语。

3 法国中学生可以在国家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中选择参加以一门现代外语或区域语言作为考试语言的一项考试内容;参见《卫报》2008年6月16日题为“法国议会承认地方语言惹怒了法兰西学院”(French Parliament's recognition of local languages angers French Academy)的报道。

策，对区域语言的支持不仅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更有可能危害区域语言的维护与发展，因为区域语言注定不能获得与现代外语同等的地位、相同的教学大纲和同样的投资力度（Ager 1999: 85）。即便如此，区域语言也会因政府历史上的消极语言态度和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区域语言的卑微价值而遭到家长和学生的排斥。更何况，地方民众既对法语始终抱有一种崇高且尊敬的语言忠诚感（Walter 1999: 24），又因现代外语的巨大经济价值和政府的大力提倡¹，自然对法语和外语更为青睐。法国这种语言决策的深层动机可谓是煞费苦心。

正因为深层次雅各宾主义语言思想的作祟，法国在区域语言教育上一直保持谨慎克制的态度（Lyster & Costa 2011），但显然，要想在国内真正实行多语制政策就必须将区域语言纳入主流教育之中。因此，如何在推广语言文化多样性和保卫法语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正是对法国政府和民众智慧的考验。

5. 多语制政策的战略意义

虽然近年来法国在国内外大力提倡多语制政策，体现了法国从传统的雅各宾主义向吉伦特派多语制思想的微调转向，但当前的多语制政策充其量是一种更为放松和文明的雅各宾主义（Judge 2001: 82）。正如2007年萨科奇在总统竞选时所表的雅各宾式决心所言，“我们有责任推广法语，为了我们的子女、为了世界文明的未来，为了保卫一种人性的理念”（Nolan 2011: 92）。萨科奇还于2009年号召启动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国族认同大讨论”活动²，动员全国民众反思“21世纪什么样的人才是法国人？”这一“身份危机”问题（Broadbridge 2011: 3）。法国总统的这番言行均明确揭示了法国雅各宾主义的法语单语制和中央集权式的语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未有实质改变而只是程度上的淡化，推崇法语的至高地位仍然是法国国家、政治和文化统一的强势话语。

因此，转向多语制政策只是由于法国面临英语国际地位攀升、国内区域语言争取权利的内部压力、欧盟制约法语传统保卫及推广方式等一系列国内外多语多文化诉求，处于十字路口上采取隐性推广法语的巧妙战略调整。这种深层动因决定了法国推行多语制仅仅只是其推广法语的一种隐蔽方式而已（Oakes 2002），其本质是法国应对国内外多语多文化诉求的政治姿态。

1 例如，前教育部长杰克·朗格2008年曾公开希望每位小学生都能成为掌握英语的双语者，而时任总统萨科奇2011年提出法国儿童应该从三岁开始学习英语的教育改革方案。参见《每日邮报》2011年2月1日题为“Sacré bleu! French to force children to learn English from the age of THREE, if President Sarkozy gets his way”的报道。

2 该活动由萨科奇倡建的“移民、融合、国民身份认同及协作发展部”（Minister of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Mutually-Supportive Development, 简称国民身份部）举办，兑现总统竞选前反复提及的法国身份认同问题，是将这一触及很多社会敏感要素的身份认同问题进一步推向了社会焦点的中心。参见张金玲（2010）。

面对全球英语的威胁，法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多语制是抵抗英语霸权、保卫法语国际地位更为有效的途径。这一具有内在矛盾的政策转向既满足了法国构建欧盟身份的内在要求，又能为其塑造一个积极宽容的国家形象，还能巧借欧盟语言平等搭建的广大平台搪塞众人菲薄的悠悠之口，从而堂而皇之地大力推广法语。正如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卡尔维（Calvet 1998: 319）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法国语言政策深层次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而已。当今多语制背后的根本目标始终是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保卫和推广法语，因为巩固法语的强势地位是法国实现其国内外政治权利的一种有力工具（Léger 2012）。

6. 结语

本文针对法国单语制和双语制政策背后隐藏的语言意识形态阐述了语言政策变迁的实质。独尊法语的单语制一直是法国语言教育政策潜在的、深层的主流意识形态，但随着国内外语境的实时变迁，这种主导性意识形态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深刻体现在法国不同时期语言政策与实施之间的不一致性。当前，这种矛盾性即法国对外宣称的推广多语制与实践中推广法语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法国语言政策中的多语制实为以法语为中心、突出法语崇高地位、其他语言为点缀的所谓多语制。推出多语制政策无非是凭借欧盟多语多元文化政策站在道德制高点，为抵御英语冲击、继续推广法语赢得空间和时间。

参考文献

- Adamson, R. 2007. *The Defense of French: A Language in Crisi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Ager, D. 1996. *Language Policy in Britain and France: The Processes of Policy* [M]. New York: Cassell.
- Ager, D. 1999. *Identity, Insecurity and Image: France and Language*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Ager, D. 2008. French and France: Language and state [A]. In G. Extra & D. Gorter (eds.). *Multilingual Europe: Facts and Policie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87-110.
- Broadbridge, J. 2011. Great debate on national identity: Language and identity [J]. *Cahiers* 16 (2): 1-22.
- Calvet, L. 1998. French language policy and Francophonie [A]. In D. Kibbee (ed.). *Language Legislation and Linguistic Right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10-319.
- Chrisafis, A. 2008. Local language recognition angers French Academy [OL]. *The Guardian*, June 16,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jun/17/france> (accessed 29/05/2014).
- Diplomatie. 2009. Promoting French around the world [OL].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the-ministers-and-the-ministry/publications/global-challenges-international/strategy-documents/article/promoting-french-around-the-world> (accessed 29/05/2014).
- Diplomatie. 2012. France & the promotion of French worldwide [OL]. http://www.diplomatie.gouv.fr/fr/IMG/pdf/FR_promotion_du_francais_version_anglaise_cle4df411.pdf (accessed 29/05/2014).

- Frey, L. & M. Frey. 1995. ET TU: Languag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J].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0 (1-3): 505-510.
- Gordon, D. 1978.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30-1975)* [M]. The Hague: Mouton.
- Helot, C. 2003.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ideolog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France [J]. *Language Policy* 2: 255-277.
- Judge, A. 2001. France: "one state, one nation, one language"? [A]. In S. Barbour & C. Carmichael (eds.).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C]. Oxford: OUP. 44-82.
- Judge, A. 2002. Contemporary issues in French linguistic policies [A]. In K. Salhi (ed.). *French in and out of France: Language Policies, Intercultural Antagonisms and Dialogue* [C]. Oxford: Peter Lang. 35-72.
- Judge, A. 2007. *Linguistic Policies and the Survival of Regional Languages in France and Britai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Judge, S. 2002. Language as a human right: A legal problem for France [A]. In K. Salhi (ed.). *French in and out of France: Language Policies, Intercultural Antagonisms and Dialogue* [C]. Oxford: Peter Lang. 73-106.
- Léger, A. 2012. *French Language-Spread Policy in Europe: European Institutions and the 2004 and 2007 Eastern Enlargements* [D].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Lyster, R. & J. Costa. 2011. Revitalization of regional languages in France through immersion [J]. *Canadian Issues* (Fall): 55-58.
- Marek, Y. 1998. The philosophy of French language legislatio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A]. In D. Kibbee (ed.). *Language Legislation and Linguistic Right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42-350.
- Mendel, K. 2004. Regional languages in France: The case of Breton [J]. *LSO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65-75.
- Nolan, J. 2011. Reassessing Gallo as a regional language in France: Language emancipation vs. monolingual language ide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9: 91-112.
- Oakes, L. 2002. Multilingualism in Europe: An effective French identity strategy?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3 (5): 371-387.
- Safran, W. 1989. The French state and ethnic minority cultures: Policy dimensions and problems [A]. In J. Rudolph, Jr. & R. Thompson (eds.). *Ethno-territorial Politics, Policy, and the Western World* [C].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15-157.
- Safran, W. 1992. Language, ideology, and state-building: A comparison of policies in France, Israel, and the Soviet Unio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397-414.
- Schiffman, H. 1996.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M]. New York: Routledge.
- Shelly, S. 1999. Une Certaine idee du francais: The dilemma for French language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19: 305-316.
- Walter, H. 1999. On the trail of France's regional languages [A]. In P. Blanchet, R. Breton & H. Schiffman (eds.). *Les langues régionales de France: Un état des lieux à la veille du XXIe siècle/ The Regional Languages of France: An Inventory on the Eve of the XXIst Century* [C]. Louvain-

la-Neuve: Peeters. 15-24.

Wardhaugh, R. 1987. *Languages in Competition: Dominance, Diversity, and Decline* [M].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

Wright, S. 2006. French as a lingua franca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6: 35-60.

戴冬梅, 2010, 法国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体系考察[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24-30。

戴曼纯、贺战茹, 2010, 法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实践——由紧到松的政策变迁[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 1-5。

吴锡德, 2002, 法国的语言政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挑战[A]。载施政峰(编), 《各国语言政策研讨会论文集: 多元文化与族群平等》[C]。台北: 客家委员会。295-339。

张金玲, 2010, 身份认同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传统——源自法国社区研究的思考[A]。载谢立中(编), 《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C]。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9-96。

作者简介: 李清清, 博士, 上饶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政策、应用语言学。电子邮箱: liqq_snwm@163.com

民族认同视角下的塔吉克斯坦 俄语地位变迁

上海外国语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杨 波

提 要：本文以俄语在当代塔吉克斯坦的作用与地位为研究对象，主要在回顾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文化交流史的基础上探析俄语在塔吉克斯坦的法律地位、社会作用，以及俄语地位折射的塔俄关系等问题。俄语在塔的地位变迁实际是塔吉克斯坦提高主体民族意识、复兴主体民族文化进而构建国家民族进程的一个侧面，也是塔俄关系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塔吉克斯坦；民族认同；俄语；语言政策

1. 引言

塔吉克斯坦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国家。19世纪末以来，塔吉克斯坦先后经历了俄罗斯帝国、苏联、独立民族国家等迥异的国家政治形态，国境多次重勘，苏联前、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政治历史因素造就了当代塔吉克斯坦复杂多样的语言格局。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共有120多个民族和族群，使用近100种语言。塔吉克人占人口总数的80%，讲塔吉克语；东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有近11万帕米尔少数民族，其语言属于东伊朗语；乌兹别克人（人口总数的15.3%）、吉尔吉斯人（人口总数的1.1%）和土库曼人（人口总数的0.3%）的语言属于突厥语；俄罗斯人占人口总数的1.1%，讲俄语（Нагзибекова 2010: 27）。目前，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和俄语是塔吉克斯坦最普及的三大语言。

1991年独立后，塔吉克斯坦的民族成分、人口结构和语言格局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塔政府着手根据新国情制定新的语言政策，目的是“界定各种语言的法律和实际地位；确立语言地位调整 and 语言建设的任务和阶段；形成公民和各族群的民族认同和语言认同；形成族群语言认知和自我认知；防止语言冲突；明确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实质和类型；制定落实语言政策的方法，评价语言规划措施的效力；关注国语功能的变化，重振国语，发挥其语言活性”（Нозимов 2010: 3）。

塔吉克斯坦宪法第2条规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国家语言是塔吉克语，俄语是族际交际语”。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十二五”俄语学科建设系列项目）“中国—中亚利益共同体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20世纪俄塔文化交流

1924年，苏联在中亚地区重新进行民族区域划界，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于当时的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塔吉克”这一名称正式开始使用。1929年，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制为塔吉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苏联在塔吉克人成立民族国家、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国民经济和教育科学方面功不可没。

1930年，塔吉克人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取代原有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40年，塔吉克标准语正式启用基里尔字母（即俄语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成为塔吉克文字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苏联时期，俄语是塔吉克斯坦最普及的语言，居民受教育、工作，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俄语。俄语还是塔吉克人向世界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技术的媒介。苏联境内各民族的交流也主要依靠俄语。

苏维埃政权的确立改变了塔吉克斯坦的人口结构，俄罗斯族居民数量急剧增长：1959年，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族居民总数为26.3万人，1979年39.5万人，1989年38.85万人。据苏联1989年人口普查数据，俄罗斯族居民占全塔人口总数的7.6%，主要居住在各大城市，例如，1989年，杜尚别市的俄罗斯族居民占全市总人口的32.4%。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塔吉克斯坦内战等事件导致在塔俄罗斯族居民大规模外迁。官方数据显示，至1997年，全塔有70%多俄罗斯族居民迁出。俄语的使用范围明显缩小。尽管如此，俄语依然是塔的一种重要语言。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约25%塔吉克公民讲俄语，俄罗斯族居民掌握俄语的比例为100%，掌握主体语言塔吉克语的比例仅为14.9%（Усмонов 2011：8-21）。

独立初期，塔吉克斯坦继续使用俄语作为公务用语，但是，无论从政治经济角度看，还是从财政支出因素考量，塔俄双语办公都难以长期维持。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迫切需要解决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语言成为最有效、最普遍的手段。多民族的客观国情要求塔政府对民族关系进行调整，包括界定各种语言的法律地位。

3. 有关俄语的法律法规

塔吉克斯坦界定俄语地位的语言法规主要有这样几部：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颁布于1989年7月22日，规定塔吉克语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际语，塔吉克公民有权用俄语接受教育和获得学位，自然人和法人可自行选择用俄语或者塔吉克语到国家机关办理事务。

《塔吉克斯坦政府发展国语和本国境内其他语言的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于1997年10月21日。《纲要》分塔吉克语条款和其他语言条款两部分，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推广国语。涉及其他语言的条款

则规定，国家必须为使用独联体国家族际交际语——俄语创造良好条件，所有中学必须开设俄语课。1998年1月1日，塔总统令对《纲要》进行了增补，要求在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推广塔吉克语。

《2004-2014年完善俄语和英语教学研究国家规划》颁布于2003年12月2日。规划要求发展作为塔吉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间交际手段的俄语；从学前教育起的普通教育各阶段不间断地开展俄语教学；按照《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教育构想》更新俄语教学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通过定期出版物、广播、电视等媒介系统宣传学习俄语的重要性。

《塔吉克斯坦国家语言法》（以下简称新《国家语言法》）颁布于2009年10月5日。新《国家语言法》的颁布是俄语地位在塔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新《国家语言法》对塔吉克语（法尔西语）作为国家语言的法律地位和使用细则作出了详细界定。主要内容有：塔吉克语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国语，掌握国语是塔吉克斯坦公民的义务；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以及军队都要用国语办公，国家和私营机构的口头和书面交际必须使用国语。各种广告、印章、机构名称、信息技术交流都要使用国语等。新法最受关注的地方是，条款中取消了“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言”的规定。

《关于在公文事务中彻底停止使用俄语的决议》于2010年3月4日获塔议会批准。根据决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公文文书起草规范》中“关于在正式出版物和议会公报上的所有法律和标准法规文本必须使用两种语言——塔语和俄语”的规定被废除。今后，塔吉克斯坦所有法律及其他标准文书将只能用国语（塔吉克语）发布¹。

《检察院机构》、《立法法院》、《人权事务代表》、《国家安全机构》、《国家反腐败金融监管处》、《国家公务机构》和《国家海关法》等国家法律的修正案于2011年5月24日获塔议会批准。根据修正案，国家政府机构公务员必须掌握国语，应聘公务员者必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塔吉克语水平测试²。

4. 语言政策与“去俄罗斯化”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99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建设本民族国家要求振兴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形成新的民族价值观。塔吉克语是国家性和独立性的象征，是国家、民族和语言认同的有效手段，因此，复兴国语成为国家语言政策的核心要素。关于字母拼写拉丁化的问题在塔吉克斯坦曾多次提出，但至今尚未掀起较大浪潮，塔仍然使用带有波斯文字的斯拉夫—塔吉克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意采取“去俄罗斯化”

1 参见杰尼斯·基列耶夫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喀山频道”2010年3月5日发表的评论——“塔吉克斯坦议会彻底废止俄语”。网址：<http://kazan.kp.ru/online/news/627751/>（2014年3月12日读取）。

2 参见“中亚研究网”2011年5月30日新闻：“塔吉克斯坦国家机构将规定只使用塔吉克语”。网址：<http://euroasia.cass.cn/news/400713.htm>（2014年5月6日读取）。

的措施，而只是“塔吉克斯坦与苏联历史达成的一种妥协，因为塔领导人认为，承认苏联历史在本民族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有利于体现本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曾向红、杨恕 2006: 161）。应该说，这是一种对待文字改革的温和态度。

事实上，塔吉克斯坦的“去俄罗斯化”已有时日。早在苏联解体前，塔政府就开始竖起恢复民族文化的旗帜，采取各种措施，有意弱化或消除苏俄的历史文化痕迹。例如，恢复一些地名的历史名称，塔吉克斯坦首都苏联时期称斯大林纳巴德（Сталинабад），1961年恢复古称杜尚别（Душанбе）；历史名城苦盏（Ходжент）苏联时期曾更名为列宁纳巴德（Ленинабад），1991年恢复古称苦盏（Худжан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发起的更改姓氏活动也是塔高层呼吁回归本民族文化的突出体现。2007年，他本人用塔吉克语构词方式构成的姓“拉赫蒙”（Рахмон）正式取代含俄语后缀的姓“拉赫莫诺夫”（Рахмонов），并下令禁止家长给新生儿注册带有俄罗斯化后缀“-ов”和“-ев”的姓。

应当指出，塔吉克斯坦的“去俄罗斯化”行动较之中亚其他国家整体上呈现出“温和性”特点，所采取的缓慢而渐进的“去俄罗斯化”方式没有引发社会的剧烈震荡。支配“去俄罗斯化”的核心始终是复兴主体民族文化、建构国家民族的思想。由于这一思想符合刚刚获得独立的塔吉克人的民族心理，因此，这些做法得到了认同。

自塔吉克斯坦独立后到新《国家语言法》制定和颁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塔吉克斯坦的语言地位规划比较统一，俄语在塔的法律地位比较高，被赋予了“族际交际语”的地位。在这段时间内，塔成为事实上的双语制国家，“去俄罗斯化”不具有全局性。

2009年10月，《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法》的颁布在塔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外各种支持和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反对者认为新法会影响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近期可能会对塔吉克斯坦实施签证制度”¹；支持者则表示许多原苏联国家早已对俄语重新定位，而且，有的国家的做法还很极端，转用国语办公的事实“从来没有使俄罗斯的伪爱国主义者们感到不安”²。

实际上，新《国家语言法》的颁布是塔吉克斯坦政治经济改革与文化战略调整的客观结果，这些变革也对塔吉克语的功能和语言结构产生着深远影响。2009年以来，塔吉克语在行政管理、广告传媒、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日渐频繁，促成了塔吉克语自身的显著变化。此外，塔官方有意识、有计划地在大众传媒上宣传国语知识，加大力度报道塔语推广过程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力求增强塔语的功能，扩大塔语的使用范围，为塔语的发展和和使用创造有利条件。

1 参见费尔干纳新闻通讯社（Ferganews）2009年10月2日标题为“塔吉克斯坦：本国公民必须学习塔吉克语”的新闻。网址：<http://ferghana.ru/news.php?id=13108>（2014年6月4日读取）。

2 参见塔吉克斯坦Asia-Plus通讯社网站2009年10月8日新闻：“部分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公然说谎”。网址：http://hrt.tj/downloads/overview/October_1-15_2009.doc（2014年6月4日读取）。

5. 俄语在当代塔吉克斯坦的地位

塔吉克斯坦独立后，俄语居民大量移民国外，俄语的日常交际功能大大降低。目前，塔吉克斯坦约有10万人以俄语为母语，其中俄罗斯族6.8万，鞑靼族1.9万，乌克兰族约3800人，朝鲜族约1700人。此外，俄语仍然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最普及的第二语言。

从社会积极性来看，俄语在当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体系中位列第二（Нагзибекова 2008: 233）。俄语是塔各级教育机构的必修科目。近几年，尽管俄语学校和班级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其热门程度在日益提高，而且，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非俄罗斯族家庭。例如，2004-2005学年，塔俄语学校一年级新生班普遍超员，人数达到36-50人（常规编制每班20-30人），以俄语为母语的新生人数仅为0-7人（Шамбезода, Дубовицкая, Гусейнова 2006: 139）。家长选择俄语学校主要是希望子女以后可以去俄罗斯就业，而且，俄语学校的教学水平普遍较高。

学术研究是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文化语言合作的重要领域。根据塔俄两国的政府间协议，塔吉克学者的学位和职称由俄罗斯教育部最高鉴定委员会（BAK）评定授予。2005年前，塔吉克斯坦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还可以用塔吉克语撰写，2005年后，则必须用俄语撰写，否则不准答辩。

大众传媒也是俄语作用于塔日常生活的重要渠道。塔吉克斯坦俄语广播、电视、出版、网络媒体都很普及，有俄语或俄塔双语定期出版物近50种，12家全国发行的报纸设有俄文网站。塔吉克国立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每日播放俄语节目。塔正式注册的10家电子媒体发布大量俄文信息。2009年，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发布的3969条新闻中1400条为塔俄双语。

劳动移民是俄语在塔吉克斯坦持续普及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塔吉克斯坦经济不发达，就业形势紧张，导致大批劳动力外流，俄罗斯是塔劳动移民的首选国家。劳动移民每年为国家带来大笔外汇收入，正在成为塔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011年，在俄务工的塔吉克人汇回国内的外汇总额约30亿美元，占塔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到俄罗斯谋生的塔吉克斯坦劳动移民的总数约为50-80万人。如考虑到年度人数浮动，最近10多年来赴俄务工的塔公民总数可达200-250万。在俄罗斯生活期间，劳动移民必须使用俄语，语言环境也促成其快速掌握俄语（Алпатов 2003: 426）。

目前，俄语在塔吉克社会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俄语是塔居民了解最新科技成果和文学作品的重要工具，塔吉克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因被译为俄语而闻名于世。从客观上讲，塔吉克斯坦目前还不具备保证所有居民掌握国语、在各

1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2012年10月5日报道：“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元首会晤后向媒体发表声明”。网址：<http://www.kremlin.ru/news/16606>（2014年4月16日读取）。

领域用国语全面取代俄语的条件。独立20年来，塔政府普及推广塔吉克语的成效还不尽如人意，免费塔吉克语培训班寥寥无几，塔语师资和教材都很缺乏。“大部分普通塔吉克人的国语水平只能进行日常交流，熟练掌握标准塔吉克语的高级政府官员也为数有限。”¹

6. 俄语地位重大事件及反响

2009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工作访问。访问期间，塔总统拉赫蒙明确向梅德韦杰夫表示塔将继续使用俄语。梅德韦杰夫则表示，俄方对俄语在塔地位问题不再存有疑问。

2009年10月，《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法》正式生效。核心内容是将塔吉克语确定为国语，所有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以及军队都要使用国语进行办公。新《国家语言法》对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的地位只字未提，在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贯将支持境外俄语教育，保护俄罗斯侨胞利益视为己任的俄罗斯政府对该法持反对态度，俄政府希望“保持俄语在塔境内的地位，并将密切关注塔吉克斯坦的俄语问题”²。针对这些舆论，塔总统拉赫蒙同年10月访问俄罗斯时回应称，新《国家语言法》只是界定了塔吉克语的使用范围，而俄语拥有宪法赋予的族际交际语言的地位。他强调说：“谁也不打算改变它（俄语）的地位……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罗蒙诺索夫和门捷列夫，舒克申和列维坦的语言不需要游说支持，即便没有任何帮助，它（俄语）也一贯拥有，并将永远拥有应有的地位。”³

2010年2月8日，塔吉克斯坦东方独立研究中心就“你对哪个国家及其人民感觉‘温暖’？”这一问题展开民调，结果显示，98%的塔吉克斯坦公民对俄罗斯抱有好感，71%的受访者认为俄语不应该从日常用语中被排除掉，66%的受访者认为俄语应获得官方地位⁴。

2011年，塔俄两国签署决议，决定在对方国家首都互设文化信息中心，以巩固俄语在塔吉克斯坦的地位。据塔吉克斯坦教育部统计，全塔共有20所俄语普通中学，前苏联时期曾有近100所。2011年6月9日，塔吉克斯坦议会上院通过法案，俄语被重新确定为族际交际语言，但塔吉克语国语地位保持不变，全国各权力机构之间的公务信函必须用塔吉克语书写。

1 参见2009年10月5日BBC俄罗斯分社阿诺拉·萨罗科罗娃的文章：“塔吉克立法者‘推开’俄语”。网址：<http://linguistics-msu.livejournal.com/12774.html>（2014年4月16日读取）。

2 参见2009年10月7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涅斯杰连科的声明：“俄外交部：新语言法将对塔吉克斯坦少数民族造成影响”。网址：http://tajikistan.russiaregionpress.ru/archives/569http://hrt.tj/downloads/overview/October_1-15_2009.doc（2014年4月16日读取）。

3 参见俄罗斯新闻社网站2009年10月22日新闻：“俄语在塔吉克斯坦的地位保持不变”。网址：<http://ria.ru/culture/20091022/190107839.html>（2014年6月4日读取）。

4 参见光明网2010年2月9日，署名张春友的文章：“多数塔吉克斯坦人支持保留俄语地位”。网址：http://www.gmw.cn/01gmrb/2010-02/09/content_1052832.htm（2014年4月16日读取）。

2012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维护族际和谐的命令》。根据该法令，除专业技术人员外，所有到俄罗斯务工的劳务移民必须通过俄语、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法律三门考试。2012年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掌握俄语能够大大促进塔吉克公民的个人职业发展，首先能扩大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使其能够轻松地获取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信息，接受教育并找到更好的工作。”¹

7. 结语

塔吉克斯坦修正俄语地位，复兴主体语言的过程始终以提高主体民族意识、复兴主体民族文化进而构建国家民族为目的。俄语地位的变迁实际上是一个由渐进式的、温和型的变革到全面化的、强制性的改革过程，体现了塔当局复兴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强硬态度。但是，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现阶段，俄语在塔社会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和普及塔吉克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目前，在行政领域用塔语完全取代俄语面临诸多困难，其他领域面临的困难更多。而且，与俄罗斯搞好关系是塔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经济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很高，约45%GDP来自劳动移民的汇款”²。

同时，俄语在塔地位问题实际上也是反映塔俄关系敏感度的“风向标”。1993年5月25日《俄塔友好合作及互助条约》签订以来，俄塔双方已经签订了130多项各类协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两国关系中问题较多的是俄驻塔201军事基地和罗贡水电站的建设问题。新《国家语言法》颁布实施于罗贡水电站贷款谈判僵持未决时期，修正俄语地位实际是塔政府向俄方施压的一种方式。2012年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塔期间与拉赫蒙总统签署了将201军事基地使用期延长至2034年的协议，双方能源合作也有新的进展。同时，普京强调了两国教育合作的重要性，重申了俄方对俄语在塔地位问题的关切。如今，面临美国和北约作战部队将撤出阿富汗，塔阿边境安全形势严峻的新情况，塔俄关系走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可以预见，未来30年，基于借助俄罗斯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考量，俄语在塔地位至少能够保持稳定。对俄罗斯而言，如何搞好与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关系，保护俄语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和权利，进而巩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文化阵地和现实利益则是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1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2012年10月5日报道：“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元首会晤后向媒体发表声明”。网址：<http://www.kremlin.ru/news/16606>（2014年4月10日读取）。

2 参见莫斯科大学“周边国家社会政治发展实验室信息分析中心”2009年11月1日发布的内容：“专家：今后50年多数中亚国家居民的第二语言是俄语”。网址：<http://www.ia-centr.ru/expert/6318/>（2014年4月16日读取）。

参考文献

- Алпатов В. М. 2003.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A]. Под ред. Чельшев Е.П. *Реш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языковых вопрос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C].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 Нагзибекова М.Б. 2008.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A]. In J. Lindstedt *et al* (eds.). *Slavica Helsingiensia 35. С любовью к слову /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Arto Mustajok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C]. Helsinki: Department of Slavonic and Bal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Нагзибекова М. Б. 2010.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A]. In A. Mustajoki, E. Protassova & N. Vakhtin (eds.). *Slavica Helsingiensia 40 Instrumentarium of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Non-Standard Russian* [C]. Helsinki: Department of Slavonic and Bal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Нозимов А. А. 2010. 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состоя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D].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0.02.22 Душанбе.
- Усмонов Р. А. 2011.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культуре и полит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J]. *Язык. Словес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а* 2: 8-21.
- Шамбезода Х. Д., Дубовицкая И.М., Гусейнова Т.В. и др. 2006. *Проблемы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M]. Душанб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Таджикского (Славя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曾向红、杨恕, 2006, 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 以塔吉克斯坦为例[J], 《国际政治研究》(2): 150-163。

作者简介: 杨波, 博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俄语词汇学、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社会与文化。电子邮箱: anjayang@hotmail.com

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语言传播新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马继红

提 要: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科技迅猛发展形势下, 俄罗斯针对俄语传播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本文从三方面论述俄罗斯联邦俄语传播新政策: (1) 在俄罗斯联邦内部从法律上加强俄语的地位: 颁布《俄罗斯联邦教育法》, 实行《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 (2) 加强俄罗斯联邦级别的俄语测试, 包括国家统一考试及对外国公民的等级等测试; (3) 加强境外俄语传播, 活动机构包括“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及“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等。

关键词: 全球化; 俄语传播新政; 俄语专项规划; 境外传播机构

1. 引言

俄语是俄罗斯联邦的国语, 也是其国际交流的工具, 是传播俄罗斯文化的工具, 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还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 在全球有相当高的普及率。当历史的步伐迈进20世纪90年代, 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科技迅猛发展对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人文、信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保障俄语与其他语言在相互交流中稳固发展无疑是俄罗斯面临的一个重要而急迫的任务。俄罗斯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俄语传播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 如: 1992年由叶利钦总统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教育法》(1996年修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4年提出要维护俄语的“纯洁性”, 2005年6月1日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国语》法案, 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整体发展提供平台。俄罗斯还力求不断加强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往来, 增强国际间合作, 加深各国之间的文化往来。俄总统普京于2006年正式签署在俄境内外举行“俄语年”的法令, 旨在提高全民的俄语能力并扩大俄语在国外的影响力。同年, 普京总统再次签署命令, 宣布2007年为“世界俄语年”, 在数十个国家举办各种俄语活动, 目的让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俄罗斯。2009中国“俄语年”和2010俄罗斯“汉语年”是继两国“国家年”之后为推进中俄世代友好、促进战略协作的又一大型国家级活动, 目的是促进俄语和汉语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推广与传播, 深化两国的文化交流, 为俄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此外, 2011年6月, 为了庆祝俄罗斯现代语言文学奠基人、伟大诗人普希金的生日, 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将每年的6月6日定为俄语节。他在2012年9月3日召开的“俄罗斯独联体事务、俄侨及国际人文合作署海外代表处领导及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 俄罗斯在全球的人文影响不符合其实力, 应该恢复上世纪90年代丧失的地位。2011年6月20日, 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2011-2015俄

语专项规划》¹。

本文主要关注俄罗斯联邦为新形势下俄语传播所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从三个方面论述其新政。

2. 俄罗斯联邦内部从法律上加强俄语的地位

俄罗斯独立后，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立法形式加强俄语作为国语的地位。1992年颁布《俄罗斯联邦教育法》²，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了俄语的国语地位及教育机构采用俄语作为国语的教育标准。此后又多次对教育法进行修订，旨在强调俄语的国语地位。2012年12月29日普京总统签署了新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³，2013年1月1日生效。

1991年10月，俄罗斯联邦颁布《关于俄罗斯民族语言声明》及《俄罗斯民族语言联邦法》。1992年6月俄联邦最高法院民族委员会通过了《保护和发展俄联邦各民族语言的国家纲领思想》，强调保护和发展俄语作为国语和族际交流语的重要性（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5.08.2008 N 638）。之后，在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六十八条中规定：俄语作为全俄罗斯联邦境内使用的国语在联邦政府和权利机构使用⁴。

1995年，俄联邦政府出台了《1995年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下属俄语委员会的№ 1221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致力于保护和发展俄语，包括众多国内外加强俄语地位的条例，其任务是：研究有关俄语方面的国家政策；维护俄语作为国语的基础；扩展俄语在国际交往和族际交往中的使用范围；制定提高俄语专家素质的提案；开展俄语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经大众传媒和出版活动促进创建俄语知识普及系统。1997年12月31日按照《1997年关于俄罗斯联邦政府下属俄语委员会的№ 1674俄罗斯联邦政府令》成立了联邦政府下设的俄语委员会。

2001年6月俄联邦颁布《联邦“俄语”目标规划构想（2002-2005年）》⁵。为此，国家投入1.6518亿卢布，主要任务为巩固俄语的国语地位。2005年12月联邦

1 参见俄罗斯标准技术文件电子资源库：“俄罗斯联邦政府2011年6月20日发布的第492号决议2011-2015《联邦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 492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целевой программ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2011 – 2015 годы»）。网址：<http://www.docs.cntd.ru/document/902285752>（2014年1月2日读取）。

2 参见俄罗斯法律文库网。网址：<http://base.garant.ru>（2014年2月2日读取）。

3 参见俄罗斯法律文库网。网址：<http://www.garant.ru>（2012年2月2日读取）。

4 参见俄罗斯日报网的报导：2008年12月30日修订的《1993年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5 декабря 1993 год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от 30 декабря 2008 года»）。网址：<http://www.rg.ru/2009/01/21/konstitucia-dok.html>（2013年10月7日读取）。

5 参见俄罗斯杜马政府网：《俄罗斯联邦2002-2005俄语专项规划》（«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2002-2005 ГОДЫ»）。网址：[http://iam.duma.gov.ru/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вестники](http://iam.duma.gov.ru/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_вестники)（2013年10月7日读取）。

政府通过了联邦《俄语专项规划（2006-2010年）》，在目的和任务条文中规定支持和推广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并加强俄语作为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交际语言地位。

2.1 《俄罗斯联邦国语法》(2005年)

早在200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将俄语作为俄罗斯联邦国语的联邦法案》（Проект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языке РФ）。该法案不仅要求俄境内各族人民、各联邦主体居民把俄语作为国语掌握，而且提倡在生活各领域使用俄语，要求公职人员提高俄语水平，“要珍惜作为俄联邦国语的俄语，要保护作为俄罗斯各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重要部分的俄语的独特性、丰富性和纯洁性。”

2005年实行的俄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国语法》中重申了俄联邦宪法中俄罗斯国语为俄语的法规¹，并规定了该法将致力于保障俄联邦国语在俄罗斯全境的使用，保障俄联邦公民使用国语以及保护、发展语言文化的权利。《俄罗斯联邦国语法》明确指出，根据俄联邦宪法规定俄联邦国语为俄语，强调必须在俄罗斯所有领域内使用俄语。《俄罗斯联邦国语法》建立在联邦宪法基础上，由现行联邦法律、其他联邦法律、1991年10月25日出台的《关于联邦人民语言》法律和其他关于调整语言问题的俄联邦法令组成。该法明确规定俄语作为俄联邦国家语言的地位，以及保障俄罗斯公民使用俄语的权利；明确当代俄罗斯标准语言规范规则，指出俄语作为国语促进俄联邦人民互相理解以及加强各民族人民联系为一体的功能；保护与支持俄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以及加强其丰富俄罗斯联邦人民精神文化的作用；不允许使用不符合当代俄罗斯标准语言规范的单词与表达法；作为俄罗斯联邦部分的各共和国不应否定或贬低俄语作为国语使用的作用。

2.2 《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

2002-2010联邦《俄语专项规划》主要目标是加强俄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以及作为独联体国家民族间的沟通交际语言。面临多变的世界格局，俄罗斯把语言政策从对内的保护和推广发展到支持海外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中的俄语传播活动。把实施对外语言传播作为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视其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复兴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2006-2010年《俄语专项规划》的基础上，俄罗斯专门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制定专门的俄语发展新规划。2011年6月20日，俄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的《№ 492》决议。教育部在2011年7月11日召开

¹ 参见俄罗斯日报2005年6月1日的报导：N 53-ФЗ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N 53-ФЗ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язы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网址：<http://www.rg.ru/2005/06/07/yazyk-dok.html>（2013年10月8日读取）。

《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科学协调委员会会议（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2011-2015 годы），提出促进俄语发展，通过了关于实行《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俄罗斯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具体实施。2012年已经在欧洲实施了一系列活动。2012年10月10日在中国北京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主办了中国俄语教学研讨会。

2010年底，俄联邦出台了《联邦“俄语”目标规划（构想）（2011-2015年）》¹，规定俄语推广的任务为：巩固国家体制，支持俄罗斯文化以及俄语，大力维护俄罗斯外国侨胞的文化和语言权利，在国外树立俄罗斯联邦政府正面形象，保障俄语国语功能的实现；为俄语作为族际间交流手段创造条件；在境外，将俄语作为发展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保障俄罗斯外国侨胞的语言和文化需求。该规划总共投入25.27亿卢布，其中联邦政府拨款21.79亿卢布支持俄语推广传播计划。

该规划第一阶段（2011-2012年）的目标是：建立科学教学法基地，制定系统方法实现俄语作为国语的功能，为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言和发展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基础语言创造条件，进而保障俄语普及以及保护俄语作为促进俄罗斯社会团结和俄联邦与外国一体化进程的手段。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科学信息和方法论体系（编写词典、语法书、指南、新一代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教材，开展针对俄罗斯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和学生的方法论活动）；创建俄语作为国语的功能保障体系（出版针对教育机构中教师和学生以及对外俄语方面的教科书和相关资料，开展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活动）；建立针对保障对外俄语考试的组织方法的措施体系；进行针对俄罗斯外国侨胞的俄语使用研究；研究独联体国家俄语发展趋势和对外俄语学习状况前景；编写并批准针对国外俄语学习中有关民族、社会和专业方面的教材及信息咨询指南；建立国外俄语教学的保障理论体系；研究与批准在国外教学使用专门远程技术的项目理论保障体系；建立俄罗斯大学的国际系统方法协调中心、独联体事务联邦理事会的基础结构网络。

第二阶段（2012-2015年）的目标是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付诸实施。第二阶段涉及教材书籍的发行与推广问题，建立国外俄语教学专门远程科技使用的项目理论保障体系，建立国外俄语教学专门远程科技使用的国际系统方法协调中心。特别是要探索出俄语作为国语的功能保障方法和建立科学信息系统（发行词典、语法书、指南、新一代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教材，促进俄罗斯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法活动）；建立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言的功能保障体系（出版针对教育机构中教师和学生以及对外俄语方面的教科书和相关资料，开展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活动）；建立针对保障对外俄语考试组织、方法的实施体系；开发国外俄语教学的方法保障系统；采取支持促进俄语教学方面的整体性措施，包括世界

¹ “构想”是在批准前的文件，批准后正式的文件为《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

范围内推广俄罗斯科技、文化和教育；完成文化传播、教育、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规划后确立国外俄语教学远程技术使用的系统内容和基础结构框架。

《联邦“俄语”目标规划（构想）（2011-2015年）》力求达到为俄罗斯在世界上树立正面形象，扩大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范围。《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全文共分十四项并附有十五个附件包括了各方面工作的目标、阶段任务和阶段成效，确定了规划总结的各种评估材料，以及社会—经济绩效指标。

3. 加强俄罗斯联邦级别的俄语测试

3.1 国内考试

全国统一考试（Еди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кзамен (ЕГЭ)）是俄罗斯全境范围内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以及大学入学考试¹。全国统一考试组织在联邦科学教育监督部和俄联邦主体全权机构下设教育部门的领导下进行。2002年开始，该考试在全国16个地区内推行。2004年达到65个地区。2006年已有来自79个地区的95万考生参加该考试。考试达标后，参加者得到登有考试成绩的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书。2008年考生已过百万。自2009年起，中学毕业考试与大学入学考试统一为全国统一考试。考试科目包括：俄语、数学、外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文学、历史、社会等，其中俄语和数学为必考科目。

公务员俄语考试（Тест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чиновников）²检测公务员的俄语水平。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将被免职。考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言语能力（18题），第二部分：正字法（12题），第三部分：标点符号（10题）³。

3.2 对外俄语水平考试

“对外俄语水平测试”（ТРКИ- Тест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⁴是自1997年来俄罗斯建立的统一外国公民对外俄语考试体系（即ТРКИ / TORFL——对外俄语水平考试）。俄罗斯《对外俄语等级测试》是为考核母语为非俄语的各界人士俄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分为俄语基础级水平，俄语初级水平和俄语1至4级水平测试。《对外俄语等级考试》经莫斯科大学科学教学法中心制定，1974年由普希金俄语学院和相关科学教学部门共同修改，从1992

1 参见俄罗斯国家全国统一考试官网。网址：<http://www.rustest.ru/egge/>（2014年3月2日读取）。

2 参见俄罗斯新闻网2011年5月19日新闻：“公务员俄语考试”。网址：<http://news.vdv-s.ru/society/?news=38393>（2014年4月2日读取）。

3 参见俄罗斯日报网：“公务员俄语测试题”。网址：<http://www.rg.ru/test/>（2014年4月2日读取）。

4 参见“俄罗斯世界”官网的介绍：“国家对外俄语水平测试体系”（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ТЕСТИРОВА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网址：<http://ruskiymir.ru/Rus>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ый>（2014年4月5日读取）。

年起由测试中心（Центр сертификационного тестирования (ЦСТ)）负责组织承担全球18个国家33个考试中心的测试事宜。考试由俄联邦科学教育部下属外国公民俄语测试领导中心的代办处实施。测试内容的设计者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友谊大学以及普希金俄语学院的专家。俄教育部授权的考官直接面试考生，根据俄语等级考试题库的统一标准进行评测，并由国家考试中心和考点共同颁发全俄认可的等级证书。

另一个考试是俄联邦移民俄语考试（Тест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а гражд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通过者标志具有俄语的基本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是外国人向俄罗斯移民，取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必备条件。考试由5部分组成，每部分达到66%的正确率才能通过考试，考试具体构成如下表：

表1 俄联邦移民俄语考试

1	阅读	45 分钟
2	写作	45 分钟
3	词汇语法	45 分钟
4	听力	30 分钟
5	口语表达	30 分钟

此外，俄罗斯计划于2012年12月1日推行“劳动移民考试”¹。2012年5月总统普京发起关于对劳动移民推行俄语、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基本法律考试的倡议。之后该提议被梅德韦杰夫政府以“至2025年俄联邦政府移民政策大纲”计划的形式确立。这个考试将针对在公用事业、贸易和服务领域的移民展开，人数共计200万。2014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法律，要求劳动移民必须通过俄语知识考试，但高技能专家除外。据悉，这项考试不会很复杂，考试形式为机测，共15道题。目前，圣彼得堡已经在对俄语考试进行试验，计划日后推广到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计划到2015年将这一法规扩展到所有劳动移民。

4. 加强境外俄语传播机构的活动

目前，俄罗斯联邦致力于俄语境外发展的组织和机构主要有：外交部、教育部、国际俄语教师协会、莫斯科市政府、普希金俄语学院、俄罗斯外交部下属俄罗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Росзарубежцентр при МИД России）、俄语发展中心（Центр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罗斯同胞理事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овет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ри ДООИ）、俄罗斯文化基金（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нд культуры）、联邦俄语协会（Федеральный Совет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等。

¹ 参见俄罗斯俄语测试网：外籍务工人员俄语测试（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мигрантов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разрешения на работу）。网址：<http://centrvraz.ru>（2014年4月20日读取）。

同时，俄罗斯成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Русский мир）、“俄罗斯独联体事务、国外同胞和国际人文合作署”（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等新的工作机构，把对外语言推广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力求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这些机构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在世界多国进行一系列的推广俄语和传播俄罗斯文化的活动，例如组织有关俄语的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举办俄语教师培训班，主办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知识竞赛，资助出版文化译著及学术专著。

“俄罗斯世界”基金会（Русский мир）成立于2007年。6月21日总统普京签署第796号《关于“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命令中规定该机构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教育部下属的社会组织，旨在大力推广普及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为世界各国俄语学习项目提供支持。该机构经费由俄联邦政府预算提供。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推广作为国家宝贵财富的俄罗斯语言和作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元素的俄罗斯文化，在俄罗斯和国外支持俄语学习项目和方案。基金会设专门的基金监督委员会和董事会。在各国开设的俄罗斯中心，由“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和世界主要教育启蒙机构合作实施国际文化规划和项目。

2012年11月3-4日，第六届“俄罗斯世界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其主题为“俄语和俄罗斯历史”。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政府会继续在政策和经济上支持“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国外设立俄语中心及其他项目。“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董事会主席、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主席维尔比茨卡娅，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执行主席尼科诺夫以及俄罗斯各界人士和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代表出席了开幕式。目前，在“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资助下，全世界共开设了89个俄语中心，其中在中国已建立7个俄语中心，为高校师生开展俄罗斯问题研讨、俄语教学等活动提供支持。

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包括：支持政府，学术界，教育界组织参与“俄罗斯世界”的有关项目；支持俄罗斯和国外的俄语语言教育项目；加强海内外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尊重与和平；提高俄罗斯的教育服务水平；协调俄罗斯地区的国际关系；加强专业知识、科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领域的交流。

资助活动是基金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旨在促进实施俄语普及和文化领域的设计与规划项目。基金会制定资助方案的评选条例，组织鉴定，并成立两个评选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受资助项目进行评估分析。基金会主要资助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宣传推广项目。优先项目包括：俄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其他世界语言；对俄罗斯以外的俄语教学给予支持；对国外高等学府的俄语教学工作给予支持；树立世界各国人民对俄罗斯的正面形象，推广有关俄罗斯的知识；与海外侨胞互动，创建尊重与和平的国际环境等。

“俄罗斯世界博士”是“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为支持国外教育机构教俄语、俄罗斯文化和其他人文课程（文化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俄国学、语言学等）设立的新目标项目。

《俄罗斯世界》杂志阐述了俄罗斯的发展问题并介绍俄罗斯文明，刊登主要针对丰富历史文化内容和保护历史遗产的问题，分析并探讨俄语问题，描述趣味人生及文化的文章。杂志有针对性地吸引俄罗斯作家和国外俄罗斯语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学家等，不断扩大吸纳外国作家的范围。

“俄罗斯独联体事务、俄侨（国外同胞）和国际人文合作署”（简称“俄罗斯国合署”或“俄合署”（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成立于2008年9月，其主要任务是促进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帮助海外俄罗斯人、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通过设在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的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海外代表处展开活动。

“俄罗斯国合署”代表会议于2012年9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¹。会议讨论了改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提高俄罗斯软实力等问题。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会上指出：俄罗斯国家软实力排名与国家实力并不相符，改善俄国家形象应当成为该署的一项重点工作。他呼吁重建俄罗斯在海外的“人文影响力”。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议把俄高校外国留学生的公费生名额从现在每年1万人增加到每年2万人。

成立于2010年9月的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是“俄罗斯国合署”驻华的官方机构，是俄罗斯政府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第一个官方文化单位。文化中心的宗旨是全面增进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推动友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总统梅德韦杰夫亲自到场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在莫斯科和北京开设文化中心无疑将为俄中两国人文领域交流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文化中心将向中国人民介绍俄罗斯的精神遗产，展示其科学和文化潜力。同时在中国传播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以扩大中俄两国的民间交往，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该中心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旨在促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是一所从事对外俄语教学与科研的国立专业院校，经过30多年建设，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外俄语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基地。为配合实施《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2012年10月12日至13日“俄罗斯国合署”、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和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俄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实施《2011-2015俄语专项规划》的重要步骤，此次活动对于促进中国俄语同行与俄罗斯专家交流，提高中国俄语教师教学水平，进而促进中俄教育文化合作具有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际俄语教师协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АПРЯЛ）现称世界俄语学会（英文：MAPRYAL），于1967年9月成立于巴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C级国际组织，宗旨是传播、发展和研究作为世界文化组成部分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目前该组织共有来自85个国家的200多个成员组织，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也是成员之一。2008年至2009年该机构在“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语专项规划》的支持下，举办了欧洲俄语节。世界俄语大会

1 参见俄罗斯世界官网。网址：<http://russkiymir.ru/Rus/Публикации>（2014年2月3日读取）。

每四年举办一次。2011年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十二届世界俄语大会，参会代表来自世界48个国家，总数超过1000人。该机构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全世界的俄语教学活动；研究科学的学习方法，协调组织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帮助建立俄语教师与其他专家间的稳定联系；实现信息交换，举办有关俄语、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国情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座谈会。该机构还监管《俄语在国外》（«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和《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通讯》（«Вестник МАПРЯЛ»）杂志。此外，每年颁发普希金俄语贡献勋章，举办中学生俄语奥林匹克竞赛和区域性、专题性会议。俄罗斯联邦还制定并调整留学生政策，加强对俄罗斯语言文化的传播，包括：重视国外留学生的招生工作，增加外国留学生的学习机会；重视国外俄语教师培养，增加外国俄语教师研修俄语的机会；重视资助国外俄罗斯语言文化传播项目。俄罗斯使馆的文化中心加强俄罗斯语言文化的传播活动，如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展），高校交流活动（国情知识竞赛）等。

总之，俄罗斯联邦所采取的新政策都将有利于俄语的国际化，有利于俄罗斯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有利的国际地位。这些政策和措施无疑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5.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面临着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在各个领域与世界接轨的挑战，以便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争得良好发展先机。俄罗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多民族世界大国几经起伏。为在国际竞争中取胜，重获俄罗斯世界强国地位，政府频繁出台和实施传播国语的教育新政，这在俄罗斯日益发展的国家总体战略上有所体现。俄罗斯正逐渐走出封闭，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始终重视民族语言问题和教育问题，并拥有普希金、罗蒙诺索夫和乔可夫斯基的俄罗斯在创新思维和创新行动中走出自己的独特轨迹。本文所述新政策展示了俄罗斯在全球化背景下向前发展的未来远景。

作者简介：马继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文化学、俄罗斯文化。电子邮箱：jhma_2003@126.com

语言管理：语言规划的新走向

——《语言管理》评介*

宁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王 辉

Bernard Spolsky. *Language Management*. 20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i + 308 pp.

1. 引言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规划（或称语言政策）的学术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大约有50多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被称为一门“复兴”的学科，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Spolsky在其新著《语言管理》中试图构建语言管理的理论模型，并将其应用到各种不同的语言使用领域。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是与语言相关的选择，不论是从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中选择一种，还是在一种语言中选择某一种方言或文体（style）。其中一些语言选择是语言管理的结果，反映了语言管理者为控制这些选择做出的有意识的、明确的努力。

Spolsky是著名语言学家，现为以色列巴伊兰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他的近著有《语言政策》（2004）和《教育语言学手册》（与Hult合著，2008）。Spolsky是著名期刊*Applied Linguistics*（始于1980年）的三位创刊主编之一，也是*Language Policy*（始于2002年）期刊的两位创刊主编之一，现为该刊名誉主编。

《语言管理》是第一本明确而详尽阐述Spolsky有关语言管理的著作。其实，早在《语言政策》（2004）一书中，Spolsky就引入了“语言管理”这个术语。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包含三个相互依赖而又独立的要素：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信念（language beliefs）、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其中，语言实践指的是看得见的语言行为和选择，即人们实际选择的语言特征，使用的语言变体；语言信念指的是对某种语言、语言变体或语言特征的价值和地位等的看法；语言管理则是指具有权力的个人或群体对某个语域（domain）中参与者采取明确的方式改变其语言实践或信念。作者将Fishman（1972）提出的“语域”的概念应用到语言管理理论当中，认为不同语域有不同的语言政策。作者主要讨论了家庭、宗教、商业、媒体、学校、法律医疗机构、军事及政府等不同语域的语言管理活动，同时还涉及语言活动团体、国际组织以及与语言相关的人权问题

* 本文为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金砖五国语言管理体制与语言政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YB125-34）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讨论。作者还指出，语言管理受语域内（domain internal）和语域外（domain external）力量的共同影响，这也反映了语言管理的复杂性。

2. 内容介绍

全书共分为13章。第1章为“迈向语言管理理论”。作者阐述了语言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语言管理理论有三个假设：一是语言政策试图解释个人的语言选择，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依赖于一个言语社区成员的信念和共有的行为。二是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语言信念及语言管理三个部分组成。三是语言政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帮助解释语言选择。作者认为：语言管理理论模型首先要在语域内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解释语言选择，但是语域外的力量也非常重要。Spolsky指出：构建或接受语言管理理论之所以要很长时间，是因为社会语言生态总在变化之中。

第2章为“家庭语言管理”。家庭语言管理是一种“有组织的管理”行为。父母在家庭中具有权威性，通常充当语言管理者角色，孩子则通常成为语言管理的对象。作者论述了不同语言背景家庭的语言管理行为，提出了家庭语言生态的管理策略，如：管理家庭语言环境、引入目标语者、安排孩子跟其他具有特定语言背景的孩子交往等策略。家庭语言选择受到家庭内外因素的影响。作者承认，内部域的作用力会受到外部域的挑战，尽管单独分析各语域的语言管理有其价值，但各个语域实际上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语言生态的影响。

第3章为“宗教语言政策”。宗教语域的语言管理一直被学术界忽视。作者主要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出发分析该语域的语言政策及其管理行为，详细考察了一些宗教教义、机构、宗教活动分子对语言管理的影响。作者还指出，不同的宗教对维持圣书语言及祈祷语言持有不同态度，宗教对语言传播和传统语言保持有一定作用。

第4章为“工作场所语言管理：商务语言管理”。工作场所的语言管理决策带有明显的商业动机，或是对某种影响公司有效运营的严重威胁做出反应。工作场所的语言管理主要解决雇员与雇员之间、雇员与雇主之间、雇员与客户之间的有效交际问题。跨国公司处理语言问题的方式包括：设定通用语、实行多语制、从公司外部雇用翻译、对雇员进行语言培训、机器翻译等。作者提出，对一门语言的价值认识是付诸语言管理努力，改变语言实践的主要驱动力。

第5章为“公共语言空间管理”。本章从公共语言标识、广告、报刊、图书、新媒体（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方面论述了公共语言空间的语言选择和语言管理。作者认为，公共空间的语言选择不仅受到语域内参与者的影响，还会受到政府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标识的象征功能在语言选择中起重要作用。公共标识使用的语言体现了语言之间的冲突，揭示了语言背后权力结构的变化。公共空间的语言管理者众多，媒体技术发展对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者都加以关注，这些因

素加大了语言管理的复杂性。

第6章为“学校语言管理”。作者从学校语言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学生、教师及其他人员）出发，讨论了学校语言政策和管理。作者指出，不同类型的学校在语言管理者及教学语言的选择上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教学语言的选择虽然政治是主导因素，但是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也会迫使学校更改教学语言，如：几乎所有大学课程都用希伯来语为教学语言的以色列，现在也面临着用英语来讲授数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教学改革。外语教学日益重要，而选择哪种语言作为外语教学语种、从多大年龄开始进行外语教学已经成为当今两个热议的话题。当然，作为语言管理者，教师的培训、资格审查、任用等成为学校语言管理的重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阐述学校语言管理时，作者肯定了学校在濒危语言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学校可能是检验语言管理理论的根本领域。

第7章为“法律与医疗机构的语言管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多语人口的发展使法律与医疗机构的语言管理日益重要，也扩大了对口译工作者的需求。作者认为语域外的压力和语域内的观念变化对法律与医疗机构的语言管理有重要影响，语言管理也受制于翻译服务所需的成本。

第8章为“军事语言管理”。作者指出，语言管理在具有等级结构的军事语域有明显优势，更容易得到贯彻执行。作者通过分析军事语域的语言政策，说明语言管理关系到国家安全。例如，“9-11”之后美国颁布了“国防部语言变革路线图”及“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从而将语言管理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第9章为“地方、区域及国家政府语言管理”。作者分析了从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是传统语言规划关注的主要问题。作者将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行为分为三种：一、下放语言管理权力；二、确立国语或官方语言；三、语言本体规划，如拼写改革，建立语言现代化和标准化机构等。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集中体现了语言的交际工具属性和身份象征属性。单语制是民族国家通常采取的语言政策，但也受到语言多样性及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思想的挑战。

第10章为“语言管理影响者：语言活动团体”。作者论述了语言活动团体在希伯来语复兴，毛利语再生（regeneration），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语言政策出台，美国唯英语运动，保持少数民族语言，抢救濒危语言等语言管理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语言活动团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语言管理力量，可以对政府的语言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第11章为“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包括超国家组织内部的语言管理和超国家组织对其他国家语言政策施加的影响力。作者通过论述联合国、欧盟等超国家组织的语言管理行为，试图说明：超国家组织在其内部语言管理中存在提高交际效率和保持多语之间的两难困境；超国家组织更多的是在传播语言权利、语言多样性理念上发挥作用。

第12章为“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机构、语言学会及其工作”。作者从语言管理的执行者出发，讨论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机构、学术组织及其相应的职责。非专门语言机构，如：国家教育部、政府负责的广播电视等媒体通常对语言的使用及传播起决定作用。专门语言机构，如法国的魁北克法语办公室、爱沙尼亚的国家语言委员会，主要负责本体规划，包括术语定名及语言纯洁化等。当然，负责本体规划和保持语言纯洁最主要的机构应该是学术组织，如术语委员会。语言习得的管理者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讲应当是一些教育管理者，如：课程负责人、校长、教育委员会等。而对外主要是通过负责语言传播的机构进行，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歌德学院等。

第13章为“语言管理理论：后记或导论”。本章与第1章首尾呼应。作者回顾了第2章到第12章的内容，总结了语言管理理论在这些语域的应用。最后，作者指出：鉴于语言管理的特殊性，目前尚无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清晰解释。作者对语言管理也表现出某种悲观的情绪。

3. 简评

《语言管理》是一本以语言管理为主题的语言规划研究专著。该书为语言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未来社会语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起引导性作用。本书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一是将语言政策划分为三个彼此联系的范畴：即语言实践、语言信念和语言管理，并依据此三分法构建语言管理模型。二是将语言管理置于不同语域当中去分析。尽管学者如Haarmann（1990），Kaplan & Baldauf（1997）等对语言规划发生的层面（如政府、群体及个人层面）早有论述，但是Spolsky首次以“语域”为依据来划分不同层面的语言管理，并试图整合Jernudd & Neustupný（1987），Neustupný & Nekvapil（2003）等提出和发展的语言管理理论，对不同语域的语言管理进行分析。这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决社会不同层面的语言问题。三是内容翔实，例证丰富。书中列举了大量语言管理实例，涉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大，很有说服力。四是强调了语言管理者在语言管理中的作用。

本书告诉读者，任何语言管理活动都依存于一定的社会语言生态环境系统中，语言选择是语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管理复杂而艰巨。当年Cooper（1989：29）认为，判断Jernudd & Neustupný提出的语言管理这个术语是否能流传开来还为时过早。但20年以后，Spolsky的专著向我们表明，语言管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本书也有些地方值得商榷。语言政策三分法作为语言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本身就有局限性。语言实践、语言信念、语言管理同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此外，本书试图整合既有的语言管理理论，但是未能与之紧密衔接，有机统一，这也是本书的局限性。

正如作者在最后一章的标题中所暗示的那样：本书将可能是语言管理理论的一个“导论”，相信能引领语言规划研究者对语言管理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 Cooper, 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UP.
- Fishman, J. 1972. Domai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 and macro-sociolinguistics [A]. In J. Gumperz &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C].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435-453.
- Haarmann, H. 1990.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ligh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86:103-126.
- Jernudd, B. & J. Neustupný. 1987. Language planning: For whom? [A]. In L. Lafarge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Language Planning* [C].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69-84.
- Kaplan, R. & R. Baldauf, Jr.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Neustupný, J. & J. Nekvapil. 2003.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zech Republic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4 (3-4): 181-366.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M]. Cambridge: CUP.

作者简介：王辉，博士，宁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
电子邮箱：huiwang@outlook.com

《少数民族语言与多语教育——连结本土与世界的桥梁》评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李 丹

Durk Gorter, Victoria Zenotz & Jasone Cenoz (eds.). 2014. *Minority Languages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Bridg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Springer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xi + 220 pp.

1. 引言

《少数民族语言与多语教育——连结本土与世界的桥梁》是Springer出版社教育语言学系列论文集的第18卷,这一系列文集旨在对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和创新活动进行深入探究。此卷由专长于多语教育和教学法研究的三位西班牙籍学者编辑而成,实为研究多语环境中语言教学活动的又一力作。

何为少数民族语言?对于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并非易事。少数民族语言一般情况下被认定为占一个国家人口比例较小的族群所使用的语言。这种单纯依据语言使用者数量的划分标准过于简单。《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第一部分第一条款将少数民族语言定义为“有别于一个国家官方语言的其他语言,通常被这个国家的部分人口所使用,既不是官方语言的变体,也不是移民者的语言或人造语言”(Council of Europe 1992)¹。从这个定义来看,一种语言一旦被赋予官方语言地位,即使使用人数很少,它也不再是少数民族语言。许多后殖民地国家是这一语言状况的真实写照,前殖民者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很小,但凭借其作为官方语言在教育、行政、司法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这种语言并不属于少数民族语言。因此,在判定某种语言是否为少数民族语言时,语言使用者数量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语言及其使用者的权力、地位和声望等外部因素必须考虑在内。

语言是一个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的载体,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对于维护世界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学校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推广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少数民族语言总是与多语教育密不可分。

* 本论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冲突论视角下的非洲国家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13JX001)的研究成果。

¹ 参见Council of Europe. 4 November 1992.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European Treaty Series-No.148. 网址: <http://refworld.org/docid/3de78bc34.html> (2014年7月29日读取)。

2. 内容介绍

全书共12章，现将各章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章 引言：少数民族语言教育面临的本土挑战和世界挑战

引言部分包括文集主线和各章内容的简要概述两部分。文集的主线为多语教育中各语言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涵盖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国语或主体民族语言与世界通用语英语在同一语境中的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的教育变革和社会变迁。少数民族往往将学校教育视为复兴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保证，它们极其渴望在学校教育中获得话语权以促进民族语言的传播和推广。在多语教育中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往往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少数民族语言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占有很大比重；第二，具有多语能力的人往往是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他们是构建多语局面的中坚力量。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各国不得不面对语言教育中的新挑战，少数民族语言、国语和英语兼习的三语制度（trilingualism）似乎成为一剂良方。然而需要警惕的是，适用于一国的卓有成效的多语教育制度不一定能复制到他国。

第二章 采用多语生存心态：南北双方应就非优势语言在教育中的关键作用相互借鉴

本章从研究现状、政策内容、具体实践等方面，针对多语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南方）与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北方）进行比较和对比研究，将研究重心置于非优势语言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上。作者启用布迪厄的“生存心态”（habitus）概念，对发达国家盛行的单语生存心态进行批判。单语生存心态是指研究者对多语现象表现出的一系列消极倾向，他们往往会无视多语、多文化的社会现实，甚至否认其具有研究、考察与推广的价值。通过对比南北双方多语教学环境，作者发现受单语生存心态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优势语言问题观念相仿，单语生存心态的消极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似有加强趋势。然而，一些经济落后、资源贫乏的国家（例如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在推进母语教学、获得社区支持、培训教师以及下放教学权力等方面为困难重重的广大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板。发达国家向来对多语教育不很热衷，但在教学项目推广、教师语言能力评估和语言课程设计等方面颇具可取之处。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语教育模式

自2002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一系列语言教育政策，旨在塑造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和英语）格局。通过对比云南、四川、广西、内蒙古、新疆、吉林、甘肃、贵州、青海和西藏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三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作者发现三语教育制度往往呈现出不完全相同的实施结果，并由此推导出四种三语教育模式，分别为共生模式、平衡模式、过渡模式和递减模式。地理、经济、政治、语言等外部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行为主体对教育模式的选择，同样成为深入探讨的话题。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使用者偏重学习普通话，这与普通话所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密不可分。然而，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对促进少数民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和学术进步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章 基于埃塞俄比亚全系统多语教育数据的对比研究：不足、多样性与成就

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语教育，这一创举为语言政策领域和双语/多语教育领域提供了新鲜素材。就语言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作者对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和语言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南方各族州（Southern Nations, Nationalities and People's Region，简称为SNNPR）进行了对比研究。前者采用中央集权式的双语（阿姆哈拉语和英语）语言政策，后者采用权力下放式的多语（包括阿姆哈拉语和英语在内的14种语言）语言政策。从整个教育系统的评估结果来看，南方各族州掌握三门语言（当地语言、阿姆哈拉语和英语）的学生在整体课业表现上优于仅需要掌握两门语言的首都地区学生。从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多语教育制度在埃塞俄比亚全国范围内推广；自2004年起，学校教育逐渐偏重英语教学，多语教育在英语强大的吸引力下开始偏离正轨，学生成绩也呈现出整体下滑的迹象。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至少85%的学龄儿童能够通过母语接受小学教育，这一成就有望为陷于相似处境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多语模式实施框架。

第五章 新加坡的创新双语模式：21世纪的多语制度

新加坡目前实施的双语制度要求国民熟练掌握英语和另外三种官方语言中的任意一种，分别为汉语普通话、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被称为“英语+1”政策。新加坡政府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语言政策主要取决于政治当局的意识形态。“双语政策框架（Bilingual Policy Framework）”、“推广汉语普通话（Speak Mandarin Campaign）”、“语言能力分班制（Streaming）”以及“推广标准英语活动（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等倡议都凸显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新加坡的语言状况由此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在推广四种官方语言的同时压制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面临新的语言挑战，与英语相伴而生的各种优势随着英语逐渐成为全球通用语而慢慢消退。因此，作者建议新加坡树立全新的语言政策目标，即在学校教育中添加一门除英语之外的国际语言，将原有双语模式转变为“英语+1(+1)”多语模式，以此提高新加坡的教育水平、经济竞争力与文化活力。

第六章 语言教育与加拿大土著民族

本章概述了加拿大土著民族的语言状况及其教育抗争史，在加拿大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探讨了相关政策、行动方案和教学策略，以此展示加拿大土著民族为争取民族自决的种种努力。随着土著聚居区城市化进程加速、电子时代到来以及土著人口中年轻人比重大幅增加，加拿大土著语言及其使用者不得不面

对土著语言使用人数大幅减少、英语同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语言难题。目前，针对加拿大土著民族最常见的教学模式是以殖民语言（英语或法语）为教学语言、土著语言为教学课程的教育。作者大力提倡殖民语言与土著语言同时用作教学语言的双教学语言模式，只有当双语能力被视为一种资产并能够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收益时，教育中的语言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七章 针对巴勒斯坦裔英语学习者的相关政策：从语言生态视角分析以色列语言教育政策

以色列建国后，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获得以色列公民资格，成为占人口比重较小的少数民族。随着以色列加强英语教育，巴勒斯坦裔学生的语言学习数由两种语言（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扩展到三种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英语），且逐渐呈现语言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研究发现，尽管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均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并分别作为巴勒斯坦裔学生和以色列学生的教学语言，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距。希伯来语作为以色列的主体民族语言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巴勒斯坦裔学生学习希伯来语往往带有很强的工具性，学习热情甚至超过对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的学习。在学校教育中，希伯来语在阿拉伯语使用者中推广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阿拉伯语在希伯来语使用者中的推广。另有研究发现，无论是从教材编写、教学目标设定还是教学效果考核方面，以色列的英语教育均没有考虑巴勒斯坦学生特殊的语言背景和社会政治文化特征。生态语言学视角强调语言学习和使用过程中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作者提倡采用这一视角分析巴勒斯坦学龄儿童的语言学习状况，意在敦促相关政策制定者全面考量所有变量，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第八章 族际和解与斯里兰卡地方语言教学

斯里兰卡具有民族多样性、宗教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特点。英国近150年的殖民统治对该国文化、语言和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国统治期间，殖民者大力提升英语地位，抑制当地语言发展，直接导致以锡兰语和泰米尔语为母语的两大民族联合起来开展保护民族语言的运动。1956年，锡兰语被赋予官方语言地位，瓦解了锡兰语与泰米尔语的反英语联盟，一场席卷了斯里兰卡30年的泰米尔人暴动拉开序幕。掌握锡兰语成为进入政府工作的必要条件，泰米尔人就此认为本民族在语言问题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遂通过“唯泰米尔语”或“纯洁泰米尔语”政策表达了渴望独立的政治诉求。为了实现族际和解，斯里兰卡政府推行“斯里兰卡国家三语制度2012至2021十年规划”（Ten Year National Plan for a Trilingual Sri Lanka 2012-2021），力求实现民族和谐共处。然而，由于缺少锡兰语和泰米尔语教师，加之语言使用者的消极态度，当地语言用于义务教育的尝试和努力时断时续，困难重重。

第九章 芬兰：萨米土著语言多语课堂语境下的动态多模态语言教学

本章分析了芬兰以萨米语为母语的土著学生如何采取不同策略应对多语教学

环境，并全面呈现出萨米语社区不断变动的语言和话语背景。从具体操作来看，作者将民族学和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应用到当地萨米语语境中，通过一组6到12岁的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的两个多模态任务，观察他们如何与周围环境互动，如何在语言选择与语言使用上受到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萨米族学生能够充分利用掌握的语言和文化资源，准确估量课堂上其他语言和萨米语之间的动态关系，成功地驾驭多语环境。

第十章 新西兰：毛利语为教学语言状况下各语言关系的平衡

以毛利语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以来广受赞誉，成功动员了所有毛利人参与拯救毛利语的运动。然而，伴随沉浸式毛利语教育的推广，英语能否或是否应该被用作教学语言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同时，如何在两种语言之间寻求平衡，如何既能满足人们对英语的需求又不破坏毛利语的复兴和传承成为热议焦点。早期毛利语复兴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毛利语语言社团的强力支持。然而，近十年来，接受毛利语教育的学生数目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表明这种热情正在逐渐冷却。学生家长逐渐转变对英语的态度，新西兰教育部教育政策出现转向，这些因素使得毛利语与英语之间的关系愈加悬而未决。本章通过对三个毛利语学校的49名八年级学生进行采访、课堂观察和读写能力评估后发现，学校教育中英语与毛利语的使用状况渐趋平衡。学生既对学习毛利语抱有积极态度，也对具有英语读写能力表现出极大兴趣，英语甚至成为大多数课外活动的首选语言。

第十一章 批判性课堂教学：利用“英语”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教育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实践

在墨西哥，英语和西班牙语享有尊贵地位，土著语言沦为落后和边缘化的标志。墨西哥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一面打着保卫西班牙语的大旗，一面将子女送入私立双语学校就读，尽早接受英语教育。本章以批判教学、批判语言学习理论和自我身份建构概念为理论基础，以墨西哥瓦哈卡州米斯特克人（Mixtec）社区为实践场景，描绘了该社区开展英语教学的情况。身兼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两个大学生虽以英语为所修专业，但二人均出身自土著语言社区。出身背景使他们能够充分尊重其他土著语言团体的实践活动，能够将学生的日常生活背景带入课堂教学。研究结果显示，英语教学并不意味着英语要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能够给予土著语言以合法性，这对扭转消极语言态度以及促进土著语言发展将大有裨益。

第十二章 多语制和欧洲少数民族语言：以巴斯克语为例

本章讨论了巴斯克语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地位变迁。巴斯克地区由三个区域构成：位于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自治区、纳瓦拉，以及位于法国境内的北巴斯克。这三个地区无论在社会语言学背景还是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巴斯克语之所以实现复兴并成为巴斯克地区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语言或教学

科目主要归功于巴斯克自治区推行的强势语言政策。相比之下，纳瓦拉以及北巴斯克地区推广巴斯克语的行动略显迟缓，效果不显著。巴斯克自治区地方政府克服了巴斯克语教师语言能力有限、巴斯克语教材缺乏以及课程设置不成熟等诸多挑战，成功实现了巴斯克语作为教学语言的逆转。巴斯克语的复兴表明，强势语言教育政策有助于少数民族语言参与多语教育，全方位开展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活动能够逐渐增加语言使用者的数量。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其他面临相似挑战的少数民族语言团体带来启示。

3. 简评

本书全面且清晰地展示了多语教育中各语言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对象横跨五大洲、十个国家，既有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也有不发达国家，如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本土与世界如何通过少数民族语言和多语教育实现沟通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编者对比并分析了不同国家多语教育政策、语言态度、意识形态和教学法以及政策具体实施情况，串连起十个对象国的具体案例分析，看似结构松散，实则环环相扣。研究内容既涉及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如何在宏观层面上影响一个国家整体语言状况，也涉及教学数据微观分析，继而深入探究学习者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态度和学习动机等问题。这本书对多语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对英语单语生存心态的批判以及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代际传承的倡议都为抵制英语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威胁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书中展示出的全新教学法为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平衡学校教育中多种语言的关系，保护少数民族使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些许灵感。

辩证地看，本书仍有可商榷之处。“少数民族语言”是本书的关键词之一，然而无论编者还是各章作者从始至终均未尝试从语言及其使用者的权力、地位角度对这一关键概念加以特定说明，仅以使用者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较小作为默认标准。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少数民族语言”这把大伞既涵盖享有官方语言地位的语言（如以色列的阿拉伯语和新加坡的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也包括不享有官方语言地位的语言（如墨西哥瓦哈卡州的诸多土著语言）。事实上，获得官方语言地位与未获得官方语言地位的少数民族语言无论在内部发展动力还是获取外部支持方面都存有较大差距。官方认可意味着一种语言的发展至少暂时得到了保证，其发展前景，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地位，是未获得官方认可的其他语言不能企及的。因此，“少数民族语言”这一概念范畴应根据语言是否享有官方语言地位做进一步细化，尽量避免语言分类标准单一。另外，编者从对比视角出发，选取语言教学情况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加以研究，并期待这些国家可以相互借鉴经验、以备己用。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语言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历史发展轨迹各异，不禁使我们质疑这种对比策略的可操作性及其正当性。虽然编者意识到某些经验具有不可复制性，但最终成书

却似乎略微偏离初衷。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本书不失为一本对少数民族语言及多语教育研究颇有价值的参考书。

作者简介：李丹，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电子邮箱：sharastone@126.com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DAI Manchun

As part of social planning,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is multidisciplinary in nature in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LPLP owing to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of issues involved.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major issues of LPLP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academics' recen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s, including definitions of LPLP, it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effect, rational choice model, among others, in order to unravel the nature of the field. There is evidence from research and practices in the past that LPLP is affected by such factors as time, re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t is argued that LPLP must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ies abroad

GUO Longsheng

Several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that focused on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ies abroad.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se book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fered evidence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ies abroa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made predictions concerning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such studies in China.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our LPLP terms: Domestic and foreign perspectives

ZHANG Zhiguo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LPLP) is such a young and growing discipline that there occur four terms for this discipline: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Besides,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are being understood slightly differently in China and abroad. Accordingly, this paper is to differentiate these terms on the basis of the trajectory of LPLP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fic understandings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n to test the differentiations of these terms via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and finally to put forward the suitable ways in choosing and using these term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ideological paradox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of France

LI Qingqing

Language policy in France has witnessed a shift from its early strict French

monolingualism to relatively loose multilingualism, which appears to demonstrate a profound change in its French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policy. However, a closer study displays many ideological paradoxes underlying this change, offering evidence for the invariant functioning of underlying Jacobinist principle “one country, one nation, one language”. The insincerity and inconsistency in French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shift clearly reveal a fact that policy change is essentially only a disguised strategy and a political gesture against internal and external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appeals.

The change of Russian language’s status in Tajikistan: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YANG Bo

Focusing on the role and status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Tajikistan,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its legal status in this countr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ussia-Tajikist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ttempts to elaborate its role in current Tajikistani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its status revealed by Russia-Tajikistan relations. In brief, the change of Russian’s status in this country not only reflects Tajikistan’s process of uplifting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Tajik, the major ethnic group of this country, and reviving its mainstream ethnic culture, but also epitomizes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Tajikistan relations.

New policy for Russian language diffus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A Jihong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Russia has made a series of measures for the Russian language diffus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language policy of Russia in three aspects: (1) strengthening the status of Russian languag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y Education Law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implementing “Federal Target Program Russian Language in 2011-2015”; (2) enforcing Russian Language Test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standard tests for foreign residents; (3) promoting the Russian language overseas through organizations like Russia World Found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稿约

一、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言政策理论研究
2.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3. 语言规划研究
4.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5. 语言生活研究
6. 语言政策及规划前沿问题研究
7. 书刊评介（仅限于新近出版的高水平著作）
8. 以上未能涵盖的其他相关研究。

二、请将研究性论文稿件字数控制在8,000-10,000字以内（字数计算含中文标题、中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书评字数5,000字上下为宜。投稿稿件中请另附英文标题及英文摘要。

三、初审、复审在编辑部内完成。初审由编辑部指定的本单位编辑或专家负责，复审由主编完成。本刊按刊物实际载文量200%的比例，筛选稿件寄送至一至两名国内外同行专家匿名外审。

四、本刊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一般审稿周期为三个月。

五、不收取任何审稿费、版面费，亦不支付稿费。被录用者赠送当期杂志4册。

六、投稿方式：本刊不接受纸质投稿。请将稿件电子版Word文档发送至 yyzcghyj@126.com。

格式体例

1. 稿件构成

论文中文标题、中文提要、中文关键词、论文正文（含参考文献）

论文英文标题、英文提要（另页）

附录等（若有）

作者姓名、单位（中英文）、通信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另页）

2. 提要与关键词

论文须附中、英文提要；中文提要200-300字，英文提要150-200词。另请给出能反映全文主要内容的关键词2-4个。

3. 正文

3.1 结构层次

正文分为若干节，每节可分为若干小节。

3.2 标题

节标题、小节标题独占一行，顶左页边起头。

节号的形式为1、2、3……，节号加小数点，然后是节标题；或一、二、三……，节号后加顿号，然后是节标题。

小节号为阿拉伯数字，形式为1.1、1.2、1.3……，1.1.1、1.1.2、1.1.3……。小节号后空1格，不加顿号或小数点，然后是小节标题。

小节之下可以采用字母A. B. C., a. b. c., (a) (b) (c)或罗马数字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对需要编号的内容加以编号。

3.3 字体

正文的默认字体为宋体五号。

中文楷体用于字词作为字词本身使用，如：

“劣字怎么念？”

英文倾斜字体的使用范围主要是：

(1) 词作为词本身使用，如：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word in English is *the*.

(2) 拼写尚未被普遍接受的外来词，如：

Jiaozi is very popular in China.

(3) 书刊等的名称。

图表的字体可根据需要换为较小的字号。

3.4 图表

图标题置于图的下方，表标题置于表的上方。

图号/表号的格式为“图/表+不带小数点的阿拉伯数字”。

图表的字体一般为宋体小五；若需要，可以适当采用较小的字号。

图表的行距为单倍。

3.5 参引

一切直接或间接引文以及论文所依据的文献均须通过随文圆括号参引（in-text parenthetical reference）标明其出处。

参引的内容和语言须与正文之后所列参考文献的内容和语言一致。

作者名字若是英文或汉语拼音，不论该名字是本名还是译名，参引时都仅引其姓。其他民族的名字或其译名若类似英文名字，参引时比照英文名字。

转述某作者或某文献的基本或主题观点或仅提及该作者或该文献，只需给出文献的出版年，如：

陈前瑞（2003）认为，汉语的基本情状体分为四类，即状态、活动、结束、成就。

直接或间接引述某一具体观点，须给出文献的页码，格式是“出版年：页码”，如：

吕叔湘（2002：117）认为，“成”做动词时，有四个义项：1）成功、完成；2）成为；3）可以、行；4）能干。

如作者的名字不是正文语句的一个成分，可将之连同出版年、页码一起置于圆括号内，如：

这是社交语用迁移的影响，即“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套用母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及语用参数的判断”（何兆熊 2000：265）。

圆括号内的参引若不止一条，一般按照出版年排序。同一作者的两条参引之间用逗号隔开，如：Dahl（1985, 2000a, 2000b）；不同作者的参引之间用分号隔开。

文献作者若是两个人，参引时引两个人的名字。中文的格式是在两个名字之间加顿号，如“吕叔湘、朱德熙（1952）”；英文的格式是在两个姓之间加&号，表示‘和’，如Li & Thompson（1981）。

文献作者若是三人或三人以上，参引时仅引第一作者的名字。中文的格式是在第1作者名字之后加“等”字，如“夸克等（1985/1989）”；英文的格式是在第一作者的姓之后加拉丁缩略语“et al.”，如“Quirk et al.（1985）”，et al.为斜体。

3.6 随文圆括号夹注

除了用于参引外，随文圆括号夹注主要用于提供非常简短的说明、译文原文以及全名的缩写或全称的简称，如：

对于莎士比亚学者来说，最重要的词典有两部：一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人 Alexander Schmidt 以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勤奋及钻研精神编纂的两卷本巨著 *Shakespeare Lexicon and Quotation Dictionary* (1874/1902/1971，以下简称 *Lexicon*)，另一部是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884-1928/1989，通常简称 *OED*)。

随文夹注的字体与正文默认字体相同。

3.7 注释

一般注释采用脚注的形式，即在正文需注释处的右上方按顺序加注数码 1、2、3……。

3.8 例证/例句

例证/例句宜按顺序用 (1)(2)(3)……将之编号。每例另起 1 行，左缩进 1 个中文字符。编号与例句之间不空格，回行时与上一行例证/例句文字对齐。外文例证/例句可酌情在圆括号内给出中译文。

4. 参考文献

每一条目首行顶左页边起头，自第 2 行起悬挂缩进 2 字符。

文献条目按作者姓氏（中文姓氏按其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排列。

中文作者的姓名全都按姓+名的顺序给出全名。英文仅第一作者的姓名（或汉语拼音姓名）按照姓+名的顺序给出，姓与名之间加英文逗号，其他作者的姓名按其本来顺序给出。英文作者的名仅给出首字母。

中外文献分别排列，外文在前，中文在后。

同一作者不同出版年的文献按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同一年的出版物按照文献标题首词的顺序排列，在出版年后按顺序加 a、b、c 以示区别。

外文论文（包括学位论文）的篇名以正体书写，外文书名以斜体书写。篇名仅其首词的首字母大写，书名的首词、尾词以及其他实词的首字母大写。

篇名和书名后加注文献类别标号，

专著标号为 [M]

论文集为 [C]

论文集内的文章为 [A]

期刊论文为 [J]

尚未出版的会议论文或研究报告为 [R]

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为[D]

词典为[Z]

网上文献为[OL]

期刊名称后的数字是期刊的卷号，通常是每年一卷，每卷统一编页码。如没有卷号只有期号，则期号须置于圆括号内；如有卷号但每期单独编页码，须在卷号后标明期号并将期号置于圆括号内。

每条顶左页边起头，回行时悬挂缩进2个中文字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语言政策沙龙” 征稿启事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语言政策沙龙”已成功举办了9期。为使更多研究者和博士生、硕士生分享研究成果和体会，现公开征集选题，详情如下：

沙龙形式：主讲人介绍个人研究一小时、参加者共同讨论一小时

研究范围：与语言政策与规划有关的理论探讨或实证研究

研究阶段：可以是已全部完成的研究，也可以是正在进行的研究
(尤其欢迎博、硕士论文的研究进展分享)

沙龙时间：通常安排在周四下午2点—4点

沙龙地点：通常安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三层会议室
计划期数：每年计划8期(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您有兴趣和我们分享您的研究，请将中文发言摘要(500字左右，包括题目、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或进度以及发言人联系信息)发至yyzcs1@126.com。被接受的发言摘要我们会及时与发言人取得联系。沙龙常年举办，随时接受发言摘要。沙龙的举办信息将定期发布在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网站：www.sinotefl.org.cn。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2014年6月

《语料库语言学》稿约

一、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料库语言学理论探索
2. 语料库与中介语研究
3. 语料库与语言对比研究
4.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5. 语料库与语言描写
6. 语料库与话语研究
7. 语料库研究新方法
8. 语料库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9. 语料库的研制与创建
10. 书刊评介（语料库相关书籍的述评。所评介的书籍限近3年出版的高水平论著）
11. 以上未能涵盖的其他相关研究。

二、请将研究性论文稿件字数控制在8,000-10,000字以内（字数计算含中文标题、中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书评字数5,000字上下为宜。投稿稿件中请另附英文标题及英文摘要。

三、初审、复审在编辑部内完成。初审由编辑部指定的本单位编辑或专家，复审由主编完成。本刊按刊物实际载文量200%的比例，筛选稿件寄送至一至两名国内外同行专家匿名外审。

四、本刊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一般审稿周期为3个月。

五、不收取任何审稿费、版面费，亦不支付稿费。被录用者赠送当期杂志4册。

六、投稿方式：本刊不接受纸质投稿。请将稿件电子版Word文档发送至 bfsucrg@sina.com。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介绍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所依托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我国开办历史最长、开设语种最多的外语院校，设有我国第一批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点和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成果丰富。2000年3月，北外以外国语言研究所为基础，吸收英语系等院系的科研力量，组建了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同年9月，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同时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主体单位。中心拥有一支精干的科研教学队伍，现有专职研究员11名（均为博士），其中9人为教授、2人为副教授，多为北外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中心还在国内外聘请了4位兼职研究员（均为博士）。中心以科研为主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努力在国内外语言政策与规划、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外语教育资源与技术等研究领域作出重要标志性成果。近五年来，中心新立项课题44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29项（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际合作项目2项，多次荣获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共计392篇/部，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22次，每年赴海内外名校学术访问约40人次；每年有2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中心进行学术交流。中心是我国高级外语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每年招收博士后2-4名，博士生15名左右，硕士生约20名；此外，中心还常年接受培养国内外高校的访问学者和硕士/博士交流生、进修生、留学生。中心开展多方面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签有合作培养协议。中心开设的专业和课程，内容丰富、新颖，紧跟国际前沿。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荣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学生们在导师指导下，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勤奋钻研，并积极参与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自2000年成立至今，中心共招收博士后19名、博士生130余名、硕士生290余名，已经出站博士后13名，毕业博士92名、硕士243名。每年有多名毕业生获北外优秀博士/硕士论文奖，并有多位博士生获北京市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中心资料室拥有丰富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书刊。现有中文图书6700余册、英文图书7800余册、中英文期刊350余种。中心承办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是全国外语界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此外，中心还创办了《中国外语教育》（季刊）、《语料库语言学》（半年刊）、《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半年刊）、《中国英语教育》（电子季刊）及内部刊物《世界语言战略资讯》（月刊），均受到学界关注。